



《记忆》129期

目 录

【专 稿】

唐少杰 “工宣队”刍议——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例

【要有光】

胡 杰 绘画何为？——关于伊娃这本书的插图

依 娃 寻找我的姨婆、舅舅和小姨

【随 笔】

启 之 暗语变形记——“红色话语”小议之三

【札 记】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四）——萧军在入党问题上的犹豫与矛盾心理

【访 谈】

戴为伟采写 冷卫口述（四）：西单民主墙

【述 往】

李南央 献给“三线”的青春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十）——田家两兄弟与“借”萝卜的故事

安希孟 北师大文革琐忆

【资 料】

1. 北京第一机床厂“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1月12日）
2.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月22日）
3. 途经莫斯科的全体国外留学生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月27日）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2月10日）

【读者来信】

1. 越人谈李南央之文
2. 张晓良谈128期的误植
3. 别题谈感想
4. 慰祖谈李南央的“五个面向”及湖北天门民歌
5. 刘建业谈任国庆之文
6. 任国庆答刘建业先生

【版权声明】

【专稿】

“工宣队”刍议

——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例

唐少杰



唐少杰，男，1959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76年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当农民；1978年2月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77级本科；同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82级研究生；1985年7月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任教。2002年8月—2003年7月，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0年8月—12月，为瑞典隆德大学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访问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著作：《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实践的哲学与哲学的实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主要译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译校，香港星客尔出版公司，2009年简体字版；台湾左岸文化，2009年繁体字版）等。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1968年7月底8月初，“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且不带引号）进驻学校，不仅遏制并结束了大学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而且使教育界具有文革中、后期的重要取向和基本特色。本文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个案，概述工宣队的某些方面。毫无疑问，在文革时期全国难以计数的工宣队中，没有哪一个工宣队像清华大学工宣队这样既是始作俑者的角色，又有辐射全局的作用，还有独特的文革实践及其经验，更有无出其右的典型影响。

一、工宣队的由来

工宣队缘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的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

由于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和“四一四”（简称四派）的论战和冲突，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斗”。这一武斗既是整个文革时期单位或部门武斗的一个典型，也是整个北京地区最为严重和最为惨烈的武斗。这种武斗不仅仅限于清华校园，还在北京一些重要公共场所（诸如天安门广场、新华门、西单、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等）有所延伸或继续。结束这一武斗，既不是上述两派，也不是清华名义上的上级主管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力所能及的，而是唯有毛泽东本人才能做到。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中、下旬，数次在北大、清华周围等地组织要求停止武斗的群众游行。四派看到这一点，数次向“无产阶级司令部”¹建议对清华实行军管或直接派出群众队伍进入清华，平息武斗。四派最后一次提出此类具体建议的时间，是7月26日即工宣队进驻的前一天！² 尽管今天受到当时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的限制，我们无法考证四派的这一建议是否送达毛泽东那里或是否为他所得知，具体地说，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是否有联系或者有何联系，但是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多多少少有些“不谋而合”。

尽管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具体步骤或细节，由于受到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等等限制还不为我们所知，但是毛泽东在1968年7月之际做出结束全国性的文革群众武斗的决定已不言而喻甚至不可逆转，³而在北京，就是要彻底结束以清华群众两派为代表的首都地区文革造反派运动及其武斗。据迟群事后回忆，毛泽东1968年7月26日下午2点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其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指着地毯上所铺的清华的地图，对与会人员进驻清华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参加的进驻清华大学动员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8341部队有关负责人等出席，部署

¹ “无产阶级司令部”特指文革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权力最高领导层。

²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文革三，案卷号：014，《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简报》。该简报汇编记载：1968年7月26日，414简报组给一些“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汇报与建议”：“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可否由谢副总理带头，组织北京工人、农民、解放军、中学生、大学生，连续一个星期每天以几万人的队伍，轮流到清华、北大这样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封锁最严的据点周围游行示威，宣传七三布告，创造和平气氛，并在此基础上再采取解决措施，拆除工事，上交武器和全部停止武斗的问题。”

³ 详见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中发【68】103号，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中发【68】113号，1968年7月24日；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这两个“布告”是结束文革群众武斗的标志性文件。

次日进驻方案，这一大会一直开到凌晨2点才结束。¹次日上午10点前后，来自北京61个企业、事业单位的三万多工人，从除了北门之外的清华各个校门涌进清华园。

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他所派出的这些工人进驻清华（当时置身武斗的清华两派群众约有600余人）遭到了团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严重伤亡（5人死亡，731人受伤）。²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在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派出计划，而且这三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使命。当时，仅有工宣队极少数的领导和组织者知道上述决定。正是由于不知道工宣队是毛泽东所派出，不仅直接造成了上述的严重伤亡，而且直接造成了团派的政治灭亡。毛泽东派出工宣队不告知清华人，成为至今都难以索解的谜。在其开始之际，工宣队的名称也由最初的“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变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变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变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革伊始的一系列决定如同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毛泽东对工宣队职能的调整和确定也是根据文革的形势而适时地做出的。由于团派武力抵抗工宣队而造成了伤亡，更是由于必须及时遏制群众运动并制止全国性的造反群众的武斗，毛泽东把工宣队作为结束大学文革造反运动的“马前卒”。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³中才得以明确。此文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写，由他本人作了多处修改并确定题目。⁴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68】135号文件）指出：“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⁵到了9、

¹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0188，《工宣队 革委会 专案组 关于“七·二七”问题的材料》。

² 1968年7月28日凌晨2点半左右，在接到周恩来报告清华大学“七·二七事件”造成流血伤亡的电话后，毛泽东脱口而出地说道：“造反派，真的反了？！”转引自《共和国历程》编辑委员会：《共和国历程》中卷第1133页（陈长江、李忠诚：《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

³ 《红旗》杂志1968年第二期，《人民日报》1968年8月26日转载。

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26—5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⁵ 还可参见：1968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发【68】139号）；1968年9月5日，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中发【68】138号）；北京已于1968年8月29日，在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泽东批示“转

10月份，工宣队进驻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已成为全国广泛而又普遍的现象。例如，上海市在9月5日到12日，有31000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十个区的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平均有50名工人。另还有5700余名退休产业工人与工宣队一起进入小学。¹

还有一个插曲：毛泽东在7月28日凌晨召见蒯大富等北京“五大领袖”的谈话中，并不关注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伤亡情况，并在召见结束之际叮嘱不要整蒯大富。²这表明，毛泽东至少到1970年11月在北京大规模进行“清查五一六”之前，都没有“审查”或“惩处”蒯大富的意思。然而，由于工宣队进驻清华所遭到的流血伤亡引起了工宣队员们的极大怨愤，为了安抚工人们，毛泽东8月6日把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赠送给他的两箱芒果全部转送给工宣队，并在稍后引起了全国性的作为毛泽东崇拜现象衍生的“芒果崇拜”现象。³毛泽东还于8月15日最后一次接见解放军副团职以上干部时，接见了工宣队代表，《人民日报》等媒体特别醒目地报道了这一接见消息。⁴

《人民日报》自1968年8月5日起，以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两周年为名，连续半个多月，连篇累牍地发表不点名地批判或痛斥以清华团派及其领导人为代表的“多中心论”的文章和报道，并于8月16日公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毛泽东已不相信文革造反派，尤其不相信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激进的造反派青年学生。

应该指出的是，工宣队与文革伊始进驻清华的工作组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来自清华之外的文革领导高层的“垂降”，给清华文革带来了“主宰”；不同的是，工作组姓“刘”（少奇），而工宣队姓“毛”（泽东）。具体地说，工作组所沿袭的是文革前的中共政治领导及政治运动路线，而工宣队是在文革破裂

发”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中发【68】140号）。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¹ 参见1968年10月7日，毛泽东批示“转发”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宣传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中发【68】147号），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² 参见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第56页，启之编：《水木清华：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

³ 《人民日报》1968年8月7日（第7334号）头版报道。参见Daniel Leese: *Mao Cult--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19-225.

⁴ 《人民日报》1968年8月16日（第7343号）头版报道。

或危机之际，所实施的不只是扭转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趋势或走向，还要进行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运动。进而，工宣队不同于1967年至1969年间广泛流行的处理或解决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虽然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有一定的工人成份，但是其领导或主干却是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干部。这种打着工宣队的旗号来对清华文革实施军人干预和领导的做法，乃是文革的一个独创。由此可问，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不以军宣队或军管的方式介入或解决清华文革两派群众的斗争及其危机？在我看来，利用工宣队的方式要“优越”于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工宣队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优点”：一是工宣队人多势众，清华大学这样的拥有数万人的单位，很难派驻数百人或数千人之多的军人来进行“管治”；二是派驻工宣队，至少名义上“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可以用理论上的强词夺理和实践上的强制推行，在清华全校各个部门或环节实施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三是军事化的管理或军事化的生活在清华大学难以全盘保证，而工宣队则可立竿见影地让清华文革摆脱一时的危机，迅速结束武斗，使得清华文革转入新的阶段；四是首先在清华大学尔后在北京其他58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工宣队，要比全部进驻军宣队更为“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在京畿不宜出现过多过杂的军宣队或被军管的大学单位；五是工宣队确立了毛泽东手下“亲兵”对于清华文革的直接占据，清华文革1968年7月底之后进一步成为毛泽东麾下独一无二的“文革要塞”。后来清华校内外流行的说法，即清华文革是“毛主席的一个点”，就是证明。

二、工宣队的功能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恢复学校秩序，稳定学校局势，力图把文革转移到与以往不同的有序阶段。长远来看，是为了取得学校的领导权，整治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监督和改造学校的各种人员，推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改造整个教育事业，并为塑造文革新人、新社会提供一个基地。

显而易见，工宣队在本质上是非清华的，完全来自于文革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政治驾驭及政策运作。自进驻清华到1976年10月后消失，尽管工宣队内部没

有细致的职务划分和明确的干部级别，甚至没有什么正式建制，¹但是工宣队的领导人就是清华大学的领导人，反之亦然。率领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张荣温（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²），1969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1月，杨德中（中共中央警卫团政委）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从当时杨德中还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可以看出，毛泽东实际上是派出自己身边的警卫干部主管清华、北大。至1970年初，清华大学约十名校级领导人中，只有刘冰一人（文革前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是清华原有的干部，其他人全部来自工宣队。工宣队是清华文革后期八年（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的政治“总督”。譬如，工宣队在清华大学所实施的“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的发布文件的范式乃至权力运作的机制，亦即工宣队高于党委会和革委会，就是清华文革不同于全国其他领域或单位文革运作的一个特例。

一方面，工宣队给清华大学的教育体制带来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清华当时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党委的政治领导，更不是革命委员会的业务领导，而是工宣队的全盘领导。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三位一体、一体同构的局面，但实际上工宣队的领导及其权威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最高领袖。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行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³仿佛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就是一块以广大清华教职员为主的“敌区”。工宣队领导人在1974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⁴这是信口雌黄，因为清华校一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就远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真正的工人微乎其微）、清华原有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革命教师”的代表席位不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工宣队凌驾于革委会和党委会之上。1969年初成立

¹ 1968年8月，清华工宣队总指挥为张荣温，副总指挥为阮世民、高世昌、刘洪生、邢云有、王杰尧、王宝仁、盛其林、张世忠；清华工宣队军代表为张荣温、迟群、谢静宜等。当时，这支工宣队共辖有八个团（直属团和一至七团），分别进驻清华各个部门或单位。这个建制很快就转入当时清华的体制。参见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80001，《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情况》。

² 当时称之为“8341部队副指挥长”。

³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30，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革委会主办：《内部参考》，1969年10月18日，第61期。

⁴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的清华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行政和教学事务的机构；1970年成立的清华党委会，不过是“抓大事”即抓阶级斗争、抓教职员工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在清华之外，还几乎没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队的权威。在恢复了清华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使着大权，这势必造成清华党组织中“党内有党”直至“党外有党”的局面，最主要的就是来自工宣队的干部与清华原有干部的区别。

其次，清华此时出现了以工人（实为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织体制。这里，无疑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工宣队把过去的“大学生”或“本科生”的称呼、称谓统统改为“工农兵学员”（简称学员），以示与过去的大学生（文革中被称为“旧大学生”）乃至整个过去的教育体制和传统区别开来，用文革的术语来说就是“决裂”。学员的取向和内涵是大学生等所无法企及的。从对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工宣队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工宣队一个别出心裁的作法，就是制造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即受教育者要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¹ 1970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后来改成清华大学直至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都要奉行的宗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一“上、管、改”的口号，逐渐演变为文革时期大学的学员政治活动机制，主要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一种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线。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² 因而，“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³

再则，工宣队在全国率先提出“砸烂教研室（组）”，指责教研室（组）是“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它从组织上造成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分离、教员

¹ 同上。

²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8，《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宣传队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经验介绍以及接待“全教会”准备工作情况的材料》。

³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4021，《东北地区我校首届工农兵毕业生调查》。

与学生分离、各门课程彼此之间分离。”¹ 具体作法就是解散基础课教研室(组),把教师编入学员班。教师的工作置于学员的班级之中,教员的一切教学计划、教学任务和政治活动都由学员班级党支部来讨论、决定。作为中国大学体制的基层单位,教研室(组)的设立引自苏联,清华此时取消教研室(组)的作法,已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经验的问题,而是取消教研室(组)的知识分子构成和业务性质,实施和体现工宣队领导下的新体制所具有的“改造并分化知识分子”的功能。

另一方面,工宣队在清华大学的所作所为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不断进行“清查、清理运动”,二是整治广大教师和部分清华原有干部,三是大搞“教育革命”。

工宣队从1968年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1976年10月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以持续不断的清查和迫害来维系它在清华大学的统治。整个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全校约有1228人被立案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或“专政对象”,58人“非正常死亡”。而在这其中,由工宣队立案审查者达到1120人(约占当时清华教职工总人数20%),定为敌我矛盾者达到167人。²1968年底至1970年,清华“非正常死亡”(实为被迫自杀)的人数急剧增多,已逾20多人,这些都说明了上述清查和迫害的残酷和惨烈。³工宣队在清华的历史,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一部整治、迫害清华众多教师和干部的历史。他们通过大大小小十余次的政治运动,给清华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套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政治枷锁。工宣队一位负责人就道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心声”：“什么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舒畅了,那么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问题。”(这一段话在发表时被改为：“广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思想平静了,感到舒舒服服了,就要检查自己是不是走上了回头路。”)。更有甚者,工宣队还把广大教职员下放“改造”,加以惩治。1969年5月,清华工宣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外鲤鱼洲建立了“试验农场”。这一农场位于鄱阳湖畔,占地约1.1万亩。工宣队把这个还没有建成的农场吹嘘为“既是一个抗大式的劳动大学式的学校,又是一个既有工业,又有农业、商业,又有科学试验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里将成为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主要基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¹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²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7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³ 参见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第九十三期。

等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同时，在这里也改造那些犯了错误的人。”¹ 同年5月至10月，清华先后有五批约2821名教职员工（约占清华当时教职工总人数的70%）先后来到这里劳动改造。这个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由于从事水中劳动和防洪等，先后有上千名的清华教职员工患上血吸虫病。

工宣队把清华广大教师当成文革的主要对象之一。197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为这种以教师为潜在敌的做法提供了某种“依据”。这著名的“两个估计”是指：（1）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所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2）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²

1970年秋季之后，许多清华教师愈益感受到“两个估计”如同两座政治大山压迫着自己，大为不满。这种对于教师所采取的可用而不可信的政策，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加敌视。特别是对于那些1949年之后到1966年之前学成而就业的教师来说，不啻是巨大的打击和否定。他们一些人针对《纪要》提出了批评。一时间，关于如何看待“两个估计”，成为清华斗争的焦点之一。工宣队一再强调，“否定两个估计，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³ 他们引用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为根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⁴ 这也就再次表明，文革把阶级的以及阶层的划分标准从过去的经济地位、家庭出身改变为现今的职业、知识直至世界观，这不能不说是文革阶级划分法的一个独创。进而，由世界观问题把知识分子当成文革的“另类”或“异己”，这也就使得文革风雨如磐的“政治革命”，必然伴随着剜心剔骨式的“破心中贼”的“思想革命”。

工宣队自1969年初以来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受到了许多清华原有的干部和教师的斥责。他们借助1972年周恩来关于教育整顿的指示精神，试图恢复过去某些合理的教学做法，改革某些工作措施，但遭到了打击和迫害。1973年10

¹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902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简报〉1969年5月31日，第179期》。

²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542—545页，国防大学，1988年。

³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想等有关材料》。

⁴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9，《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材料》。

月至12月，清华上上下下开展了一场“三个月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整治被称为体现了“旧教育路线回潮”的一大批清华干部和教师，有64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403人被点名批判，被指责的或被迫作检查交代的人难以计数。¹他们的目的被斥为“就是进入一个不要工人阶级领导，不要无产阶级政治，不要改造世界观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就是资产阶级专政。”²只是由于1974年1月开始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三个月运动”才告一段落，没有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今天，把在“三个月运动”中受到审查和批判的上述清华干部和教师的言论汇集起来看，主要是对以下方面的不满和指责：文革教育政策，文革种种行径，祸国殃民的极“左”作法，大学状况，知识分子的待遇和遭遇，江青、王洪文和张铁生等人的言行，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及政治迫害，一些领导干部的作风，外交政策的转变，毛泽东本人的矛盾等等。³这些不满和指责，表现出清华大学当时许多人对文革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

工宣队与“教育革命”可喻为形影相随。关于“教育革命”问题，我在下一部分专门论及。质言之，工宣队有没有给清华大学带来教育建设、科学发展、学科创新和学术进步？历史的回答是：否！

毋庸置疑，进驻清华的工宣队，在文革时期的所有工宣队中充当着执牛耳或领头羊的角色。这不仅是由于这支工宣队直接来自于毛泽东的授命，而且它是整个文革的后八年大学领域的“政治风向标”。这支工宣队的成员，平均学历不高，大致上不超过初中水平，绝大多数成员过去根本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他们在大学教育业务上不可能与清华的教师和原有干部同日而语。他们被套上了由毛主席派到大学天地的政治光环，真正开创了“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冲击业务”的局面。“工宣队模式”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教育主张和教育政策的集中折射和体现。毛泽东由其早年的民粹主义理念和反智主义情怀，嬗变为文革时期乌托邦主义的“教育革命”，这是清华大学的不幸，更是中国教育的不幸！

¹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8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²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临核查，案卷号：022，《整党办公室核查组“文革”中大事件调查报告 1.关于“三个月运动”，2.“三个月运动”中被迫害同志的材料》。

³ 同上。

三、工宣队与“教育革命”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真正开始，是在工宣队进驻清华之后。显然，文革头两年群众运动的论战和武斗，无法使“教育革命”铺展开来。工宣队进驻清华，为“教育革命”的全盘实施提供了基本的政治领导保障。

工宣队不断强调，“教育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建校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灵魂，是解决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¹“在一定意义上讲，工人阶级占领文化教育阵地，就是占领广大知识分子的群众。”²

1970年7月22日，清华工宣队发表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以下简称《创办》），概述了清华“教育革命”的主要经验。这份经过姚文元等人修改、张春桥定稿的文章，可称得上“教育革命”的“范文”。以《创办》为标志，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方案首次以比较系统、具体的形式出现，它是后来被称之为“教育革命的‘圣经’”³的1971年7月《全国工作会议纪要》的某种“雏形”。它所总结的清华“教育革命”共有六方面内容：（1）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2）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3）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4）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5）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6）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在清华连续四年（1966—1969年）没有招生并中断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创办》却“理论先行”，为文革的大学办学画出了“蓝图”。《创办》一文对于文革时期的大学办学具有指导意义，标志着文革“教育革命”体制的初步形成，成为文革时期全国通行的大学教育大纲。

“教育革命”在清华体现了无以复加的偏执和独断。工宣队领导人多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今后，检查一个办学点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主要看这几条：工农兵管教育管得怎么样？教师、学生与工农兵结合做得怎么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上好阶级斗争主

¹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目录号：案卷号：69014，《工宣队、革委会关于“七·二七”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有关材料》

² 同上。

³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5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课做得怎么样？”¹“教育革命”的目的，就如同清华文革写作班子“秦怀文”撰文所说的：“我们的专业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首先要上的是阶级斗争的专业”。²迟群概括为：“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³他曾强调说，清华大学只有一个专业，这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工宣队所领导的“教育革命”，实质上是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的极左化，具体地表现在招生、师资、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面所进行的“革命”上。1970年3月，北大、清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就培养目标、学制、学习内容、招生时间和名额、学生条件、招生办法和地区、学生待遇、分配原则等八个方面作了规定。提出，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文化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个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战备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⁴同年6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这份报告，这一报告及其相关精神成为1970至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圭臬。

“教育革命”进行之际，师资只能是“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职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和依赖这些教师，但是这种“教育革命”根本没有自己的所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故不可能撇开已有的师资力量而另起炉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政治上不可信的教师去从业务上培训学员。因而，“教育革命”的师资政策十分矛盾而又荒唐可笑。1970年招生后，即使教师们从事教学，也是动辄得咎，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具有教学的主导性和积极性。“教育革命”的斧钺不可能放松对于广大教师的威慑。工宣队经常使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对付教师们，并且有了“经验”之谈：“有了群众，就有了敌情；发动了群众，就暴露了

¹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6036，《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关于教育革命的形式问题、总结、规划设计等有关材料》。

² 秦怀文：《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大学教育》，《教育革命通讯》，1975年第2期。

³ 转引自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23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⁴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0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招生（试点）、应届毕业生情况的请示报告等材料》。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7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敌人；依靠了群众，就无往而不胜。”¹

工宣队所推行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意味着对于教育的仇视和对于教育者的鄙视，如同当时清华工宣队一位领导人所说的：“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红卫兵（学生）的夺权是一事无成的。……事实证明，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²同理，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清华“教育革命”的众多事实说明，如何对待“教育革命”则意味着如何对待工宣队，反之亦然。因而，“教育革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工宣队的成败，反之亦然。但是，“教育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原因有二。

其一，“教育革命”是一场蒙昧而荒唐的“革命”。它是文革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为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³“教育革命”的实质是什么呢？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大致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育平均主义等等。⁴而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因为，“教育革命”带来的是窒息精神，禁锢思想，扼杀教育，破坏教学，从而毁坏人才建设，阻碍文明发展。“教育革命”的的确确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场文明的大反动。

其二，“教育革命”是反动而可耻的“革命”。“教育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作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就在相当大的范围演变为仅仅由单位或部门少数领导人具有决定“保送上大学”的权力实施，实为“走后门”。据当年清华有关领导到有关的系、班级调查，发现在不同系、班级学员总人数中“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12%，个别班级高达约20%左右。这种“走后门”现象也是全国性的。“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⁵因而，“教育革命”的一个先天性的、不可治愈的弊端，就是它固有的封建特权的文化“基因”及其精神“遗传”。由此，“教育革命”是由蒙昧走

¹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68009，《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首都工人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报〉1968年11月15日第88期》。

²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案卷号：71007，《工宣队、革委会、党委会 党委及有关人员在校内外会议上的讲话》。

³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第8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⁴ 参见杨东平：《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文汇出版社，2003年；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⁵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第9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向启蒙、古代走向现代，还是大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和破产。它致使教育沉沦为文革的附庸，致使大学沦陷为文革的屠场，全盘扭曲甚至瓦解大学教育应有的取向和职责，竭力阻滞人才的成长、思想的探索和学术的创造。从“教育革命”理论的缺陷和谬误到其实践的变态和丑陋，无不表明“教育革命”及其方方面面充满着无法解决的异化和悖论。因为，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本身就是反教育的。

四、工宣队的分化和终结

工宣队最初进驻清华大学时有三万多人，到1968年8月下旬锐减到5140余人，1970年代初保持在数百人，到1975年底至1976年10月，只剩70余人。自进驻清华大学起，工宣队就由来自不同部门或单位的人员构成，主要来自中共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一师、海军后勤部、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等单位的军人以及北京市诸多机关和企业的干部、工人等等。这些军人来到清华后，依然保持着军籍，一些军人多年后在清华就地转业任职。

从1970年起，清华工宣队的两个人物迅速崛起。作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的“钦定亲兵”，迟群（原中共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毛泽东的速记员、机要员）不仅给清华而且给整个文革都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例如，他们对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起了直接的作用；¹又如，谢静宜还参加了审查林彪事件及林立衡本人的工作；²另外，他们直接领导并具体指导着毛泽东文革晚期的写作班子即“梁效”大批判组。³

特别是迟群本人，对文革有两个独特的“贡献”：一是1968年春夏，毛泽东派出其身边的警卫部队干部进驻北京的“六厂二校”，⁴直接指导这些单位的“斗、批、改”，以便把它们经验推向全国。作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主要

¹ 参见《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74年1月25日），载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第90—109页，国防大学，1988年。

² 参见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第14—16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

³ 参见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第7页、第19页、39页，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

⁴ “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木材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负责人，迟群执笔撰写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好评，认为是“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批发全国。¹ 以此稿为标志，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迟群本人还在清华向来自全国各地、各单位难以计数的人们做过上百场介绍清华“斗、批、改”经验的报告。二是1971年春夏，作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为4月15日至7月31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执笔撰写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修订后，毛泽东8月13日审阅同意，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²这个纪要的要害，就是前面所述的“两个基本估计”。

作为文革教育领域著名的“两个基本估计”的一大政治推手，迟群成为毛泽东派至清华大学乃至教育领域的一大政治打手。迟群当时年富力强，很快超出了他当时的工宣队同事，继杨德中、张荣温之后，于1972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工宣队第一把手。他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教育路线和政策，成为毛泽东的清华文革后期“总监”。

谢静宜的最大政治资本，在于她有着迟群等人所没有的直接可与毛泽东联系的优势。虽然谢本人的表达、组织和工作能力远不及迟群，但是迟群和工宣队要主宰清华大学，就必须有谢静宜这样一位可及时地传达并实施毛泽东旨意的通天人物。的确，这两位大概只有初中学历的军人，自1972年起对于清华文革的掌控，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毛泽东，所以他们被称之为“毛主席的两个‘兵’”。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之后，谢静宜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作为清华第二号人物，谢静宜在清华校外的职位和权力，由于毛泽东的青睐和提携，很快超过了清华第一号人物迟群。1975年初，“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曾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的迟群梦寐以求担任教育部部长的愿望落空，迟、谢的关系开始紧张而微妙。迟从骨子里瞧不起谢，因为谢本人的工作能力及谋划水平很差，但是迟又离不开谢。二人的关系是政治上的若即若离或相互利用。有谢静宜充当自己的清华副手，迟群上可通达天庭，下可更有效地驾驭那些清华原有干部的势力。然而，迟、谢在1975年初之后关系的紧张，既为清华原有干部所不齿，更为工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1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² 同上，第388页。

宣队中不是来自中共中央警卫团的几位军队干部和工业干部所大加利用。

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¹两次写信给毛泽东的直接起因，是清华工宣队原负责人之一的柳一安（原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干部）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宣队工作回来之后，迟群没有给柳安排工作。柳发起并联系惠、吕二人，准备联名“上书”²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惠、吕二人充分意识到，写信给毛泽东本人，还必须有一个比他们“高一位”的清华主要负责干部来署名，这样才更有力量。经过刘冰的同意，他们四人达成了写信给毛泽东的决定。他们四人写信的直接目的，是希望毛泽东派人来清华大学了解迟、谢问题，进而最终把迟、谢从清华“搬走”。³ 他们四人清楚地意识到，不经过毛泽东的首肯或介入，他们乃至整个清华大学都无法解决迟、谢问题。然而，他们力争让毛泽东先派人来清华调查迟、谢问题的想法，是否会走向反面？看来，他们当时并没有充分估计到。

可见，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当时的领导人中威信很低。清华能有四位校级领导干部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的问题，这说明了什么？而在这四名干部中，刘冰并不是写信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只不过是排名在首。但他同意并参与给毛泽东写信一事，就表明他对迟、谢极为不满。另三位干部则是“正统”意义上的工宣队干部（其中两位是解放军干部）。他们三位对于迟、谢的“反抗”，表明清华工宣队作为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主导力量，根本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政治的拼斗和厮杀。清华工宣队许多不是来自 8341 部队的干部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迟、谢的跋扈和专断只缘于他们来自毛泽东身边。也正是迟、谢的跋扈和专断，清华工宣队的分化在所难免。工宣队内部的斗争充分表明，1975年至1976年的清华文革更加牢固、突出地捆绑在毛泽东的文革战车上，并驶向由于毛泽东去世才停止下来的不归之路。

1975年11月3日下午3点，有53人出席的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在第二教学楼二层会议室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会上说，根据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讨论刘冰等人两封信的问

¹ 刘冰、惠宪钧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柳一安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吕方正时任清华大学政治部主任。

² “上书”一词带有封建色彩，故本文使用“写信”一词。

³ 唐少杰 2005年10月19日对惠宪钧的采访录；参见唐少杰：《我们写信告迟群》，《炎黄春秋》2008年第6期。

题实质。吴德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批评。¹正是由于刘冰等四人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们写信的批评，他们在这个会议和稍后的会议上同迟群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斥责。刘冰本人是在11月15日晚列席政治局会议时，才第一次听到了由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对他们写信的批评。²毛泽东的上述批评第一次在清华大学全校公布，是在1975年11月18日举行的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上，由吴德作了传达。³上述11月3日的会议“故意”不传达毛泽东的批评，意味深长。从当时传达毛泽东批评的步骤来看，为了批判邓小平，试图通过刘冰等人的反应来决定有关部署。

毛泽东批评刘冰等四人写信所带来的作用和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的范围，致使清华大学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处在文革政治的风口浪尖。迟群、谢静宜与中共中央上层努力配合，把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及“批邓斗争”引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例如，1976年3月26日，清华、北大十余人列席政治局会议，当面批斗、声讨邓小平本人，⁴开创了中共历史上由基层组织人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面斗争中央领导人的先例。另据不完全统计，1975年底至1976年春夏，全国各地、各单位约有30多万人次来清华“学习、取经”，还有十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记者来清华观摩“批邓运动”及大字报。

自1975年11月起，迟、谢以及清华工宣队在文革最后的十一个月里，大力巩固他们在清华的地位，大力整合清华文革的干部队伍。他们几乎把清华大学“打造”成了文革后期的政治堡垒，成为文革后期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尖兵”。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将随着毛泽东生命的结束而很快结束。在“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不到三个小时，迟、谢就束手就擒。如同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寿终正寝，迟、谢的政治死亡意味着清华工宣队步入黄泉。

从全国来看，到了1970年代初期，除了北京，各地的工宣队更多地流于形式，并有诸多的曲折起伏。例如，我当时就读的家乡中学（济南市第九中学）的工宣队，到1970年代初就成为只由两三个工人所代表的符号，这些工人只负责

¹ 2013年底，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一书，在记述到毛泽东1975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对刘冰等四人两次联名写信状告迟群、谢静宜的有关批评，写道：“11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评。”参见该书第六卷第621页。这一记述明显有误。

² 刘冰：《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第24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³ 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2，卷宗号：76016，《清华大学1975年11月3日至1976年12月31日大事记》。

⁴ 同上。

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包括清华工宣队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工宣队到了1976年10月，可谓魂飞魄散，悄然而终。在文革正式结束之后，中共中央没有下发过像解散红卫兵¹那样的文件来撤销工宣队，也没有对工宣队做出正式的、具体的评价。今天看来，这种似乎不屑一顾的态度，所传达的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清华工宣队不断整治、迫害清华大学的众多干部、教师，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提升、强化自己的权力和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清华工宣队是长达八年时间里毛泽东文革在清华的“化身”或“替身”，频繁地影响、推动全国文革的大局。在很多情况下，大大超越了工宣队自身的功能，致使清华文革不堪重荷，难逃清华大学之外更大的文革政治风浪的摆布和捉弄！■

此文的删节版原载于2015年2期《炎黄春秋》，应作者之请，特将其带注释的完整版在这里刊发。谨此说明。

¹ 《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概要）》（1978年8月19日），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第二版。

【要有光】

绘画何为？

——关于伊娃这本书的插图

胡 杰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伊娃。2012年，伊娃给我寄来了她的散文集《我的故乡》，把她生长的黄土高原上的土坷垃写得很有质感，像在田埂上拾起一个土块，随手一捏，就呈现出一个黄土的人形。后来知道她从美国又回到了家乡的沟沟坎坎里，写她母亲那辈子人的故事。当我听她说，她母亲是个乞丐的时候，我心里一震。这不仅仅是她的直率，还因为我也了解一点逃荒女人的经历。我在拍摄《星火》的时候知道，在大跃进的后期，甘肃陇西地区有很多妇女逃荒去了陕西省，在那里只要嫁个人都可以活下来。而伊娃的妈妈就是逃亡中的一位。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她触摸到了1959年到1961年中国当代史上沉默的大饥饿。然而，伊娃与众不同，她没有就此而止，而是勇敢独自前行，沿着母亲还是大姑娘时的逃荒路线去实地采访。可以想象，一个生活在美国并有了基本人权意识的她，再次融入那片传说着神秘故事的黄土地时，她的不同情感。

伊娃在2013年底的一次来信中说，她要出一部关于大饥荒的书了。问我可不可以为此画插图，我回信说可以试试。我这样回答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也接触到了大饥荒。那是我在1999年拍摄《寻找林昭》这部纪录片时，我逐渐知道了“三年自然灾害”不是来自“自然”，而是一场惨烈的人祸，来自那场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运动。后来我拍摄了河南光山县一位农民老伯吴永宽的纪录片，他为全村74位在1959年冬饿死的村民修建了纪念碑。而当时他的村庄只有一百三十几人，饿死一半人还多。需要强调的是，这块纪念碑至今仍是中國大地上，为三年人为灾祸而饿死的上千万同胞所修建的唯一一块纪念碑。后来，我走访了安徽、云南、甘肃、四川、辽宁等地。随着采访的深入，在我眼前展现的不仅是文字资料，听到的不仅是被采访者的述说，还有在脑海中时时出现的一幅幅惨烈场景。

作为一个职业的画家，我有在本子上画草图的习惯。虽然我找到了用纪录片

的表达方式，但面对这些草图，我却没有找到用绘画语言加以表达的方法。

后来伊娃给我发来了12段用于制作插图的文字，这成了这组绘画的出发点。我用木刻版画的形式进行了表达。这些绘画无法抵达伊娃的疼痛和这些具体人的饥饿与恐怖，我也常怀疑用具有局限性的绘画来表达公共记忆可能性，甚至怀疑绘画本身。伊娃发来的是这样的文字：比如，嫂子在人家屋檐下睡了一个晚上，对来接她的哥说：“你怎么才来接我？”就咽下最后一口气。又如，14岁的魏连福扒火车去逃荒，却进不了车厢，只有挂在车厢外面，胳膊从把手里伸过来，用牙齿紧紧地咬住大拇指头，以防掉下去等等。这些都是我在采访中听到过的，是在中国大地不同的村庄由那些操着不同乡音的老乡们见证的事情。

绘画已经和人类共同走过上万年，近代各种流派缤纷而过。绘画本身的美学力量是什么？那震撼我们心灵的现实怎样才能表达？我在采访中，有很多右派知识分子，面对被迫害的自我，面对身边的暴力，面对难友的一个个死亡，似乎已经麻木。他们劳作在改造思想的工地上，有思想的人陆续被暴力、劳累、饥饿所消灭。我见到的文字，是揭发难友的纸条，是自我检查；见到的绘画，是颂扬大跃进的宣传画，是那些大师们画的喜笑颜开和揭发批判自己同伴的漫画。绘画何为？有一位死过一次的右派告诉我：当自己将饿死的时候，整个身体很平静，甚至没有痛苦，大脑已经没有思想了。饿死的人是面带微笑的。这是我不止一次听过的故事：当走过一个已经饿死的母亲时，看到孩子还趴在母亲的尸体上吮吸着母亲的乳头。那种心里的疼痛怎样表达？《星火》里的向承鉴，是用决绝的文章和记录的文字表达的，是用在法庭上义正词严的怒斥表达的。伊娃的那个小亲戚魏连福，身体悬挂在列车的车厢外，为了不使自己掉下去，他咬着自己的手指。是人类求生的极限。绘画可以画出魏连福的生存极限吗？那些死去的，从农村的孩子到劳教的知识分子的底色，画得出来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底色？道德沉沦是什么底色？按照吴永宽老人的话说：“那已经没有社会了”。恐怖和死亡已经彻底改变了价值的标准。

绘画，是心灵的草图。所有的绘画都是心灵的未完成时。我对自己提出的方向，是现场的深切性。用刀刻和黑白来表达，是这组绘画的情况。这是我用绘画感觉抵达思考的方式。■

2014年1月于中国南京

【要有光】

寻找我的姨婆、舅舅和小姨

依 娃

我本名宋琳，作家，大饥荒调研者，目前居住美国麻州。我要寻找 1958 年—1962 年中国大饥荒中，出门逃荒要饭，从此失踪的三位亲人——姨婆刘环琴、



表舅俊俊、表姨俊之。刘环琴为我外婆刘玉梅的二妹妹，甘肃省秦安县魏店乡人，时年三十多岁，白净秀气，个子不高，小脚。她的丈夫叫金海，是一位民间秦腔艺人。因为当时严重的饥饿，家中断粮，我姨婆和丈夫商量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儿子俊之五六岁，女儿俊俊十一二岁，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强林，于 1960 年冬季离开了魏店乡的家，出门逃荒要饭，从此以后不知去向，失踪至今。母子三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中，再也没有任何音信。她的丈夫（插图：寻找姨

婆、俊俊、俊之）金海曾到兰州、白银一带寻找，到处张贴寻人启事，都没有任何消息，找不到下妻子儿女的下落。他也曾多次来到陕西各地寻找，仍然没有任何音信，死不见尸，活不见人，成为她的丈夫、她的儿子、我的外婆、我的母亲多年的伤痛。“人可能都死在外面了，不然，两个娃大了，知道回来找我们，家就在魏店街道。”我的母亲常常这么念叨。“就是死在半路上，也没有人知道哪里来的人，就是让狼吃了也不知道。那些年，出门逃荒饿死的人、冻死的人多得很。到哪里找去？也可能让人杀着吃了……或许迷路了，死在山里了，世上没有人了。”母亲快七十岁了，常常念叨她 1960 年出门要饭去的小姨，我的姨婆。如果表舅俊俊、表姨俊之还活着，如果你们常常给你们的后代讲述你们逃荒的经历，如果你们的儿孙辈看到了我的书和这份“寻人启事”，请和我联系。任何知情人、有线索的人，请和我联系。感激不尽。■

【随笔】

暗语变形记

——“红色话语”小议（三）

启之

一提起暗语，人们立马会想到黑社会，想到土匪，想到扒手特务间谍卧底地下工作接头暗号、007、FBI，“长江长江，我是黄河”等等。总之，会把暗语与那些法外之徒、保密机构以及种种地下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严重的误会，事实上，暗语用途广泛，几乎无处不在，每个家庭、每个团队，每个小圈子都可能有自己的“特定的词汇或习语”，也就是暗语。

上小学的时候，一下自习课，楼下就会有人喊“乌利斯基”，我们班的男生都知道，这是找人玩“骑马打仗”。于是就会高喊着“李林斯基”奔下楼去。这两个“斯基”是《列宁在十月》里的两个俄国人名，因为它们在电影里的配音都有些怪声怪调，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男生们先是模仿，后来就把它们当成了暗语。

在内蒙插队的时候，我们男知青最爱说的词就是“体现”，这是我们自创的暗语，是“表示”、“关心”、“与异性联系并示好”等意思的混合体。“这些剩下的莜面，是女生体现给咱们的。”“嘿，不能光让人家体现，咱们也得体现体现。”不用说老乡，就是外村的知青也不知道这个“体现”是咋回事。

暗语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让圈子外面的人明白。如果不是中央文件的解释，谁能知道“五七一”是“武装起义”？谁能想到“B52”指的是伟大领袖？如果不是被列入反党集团，林彪读书笔记中所写的“一号”、“老东”、“老夫人”、“不要骑上去”、“勿上敌箝制队、游击队的当”等等暗语，恐怕永远没人知道。

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开了一个研讨上山下乡的会，我在会上有幸认识了几位作家和当年的逃港知青。从他们那里，知道了“督卒”和“起锚”这两个暗语。

“督卒”是文革前广东人使用的暗语，意思与普通话中的“拱卒”差不多。逃港者都是下层百姓，在中国这个政经大棋盘中，他们是地位最卑微，生命最廉价，随时可能被牺牲掉的小卒子。为了逃避土改，为了吃饱肚子，或者只是为了家团圆，他们投奔怒海。一旦走上偷渡之路，他们就像棋盘上的小卒子一样，

只能拱前，不能退后。海水无情，边防无义，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一旦过了“楚河”，这些小卒子就成了车马炮，获得了新的人生。¹

“起锚”是文革中广东知青使用的暗语，本义是船舶开航的意思。“但在那疯狂的年代，在一群特定的人群（广东知青）中，却有另外一个意思。在广东，当年一提起这一专有名词，人们都知道那是什么一回事，那就是暗指偷渡。²

“起锚”是以生命做赌。我曾读过一个守卫深圳边防的解放军战士写的文章，文章说，逃港知青在偷渡时，常常头顶着半个西瓜皮做掩护，战士们则以射击海面上的瓜皮来练习枪法。一枪射去，瓜皮四周的海水变红，大家欢呼，如今想来颇有悔意云云。除了边防，还有鲨鱼，中途中被咬死而葬身大海者无法计算。“那时参与这个赌博的广东知青为数不少。有的赢了，有的输了。人生如梦，几十年后回顾一下，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多年，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不知我们（起锚）的一群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说不定留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与结局。当局虽然在1979年特赦了我们，以‘非法探亲’的名称把我们从轻发落，但是对于当年广东知青大量偷渡的历史事实，双方都讳莫如深，不愿提起。”³

语言与社会互动。一方面，社会的变迁引起语言的变化；另一方面，不同的社会环境对同样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读解。看过电影《金光大道》的人，可能还记得，芳草地农业合作社大影壁上“发财致富”那四个大字，是怎样被朱铁汉铲掉的画面。可能还记得，村长张金发“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言论，被高大泉批得狗血喷头的情景。而现如今，发财致富成了从上到下的指导思想，张金发的名言成了全社会的人生指南。

遥想当年，稳据“黑五类”之首的“地主”足以令人谈之色变——土改时，本人被批斗，女人被作贱，财产被瓜分。文革中，城里的地主被赶回老家，而老家，比如北京大兴，一夜之间杀尽地富全家，婴儿孕妇不可得免。湖南道县，杀一个地主或家属可领一元钱补助，重赏之下，创下了一人杀66人的高产纪录。而那些嫁给地主，或与之有亲属关系的贫下中农，亦在可杀之列。活埋、铕杀、沉塘、火烧……，杀法不一而足。⁴现如今，北京街头散发的房地产小广告上，

¹ 详见李建中：《“逃港潮”与中国知青》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页132—136。

² 黄东汉：《波涛汹涌偷渡客——起锚之一》，《记忆》增刊，2013年。

³ 同上。

⁴ 详见谭合成：《血的神话：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公司，2010年。

赫然写着“找回地主的感觉！”

不同的语境对“地主”、“发财”一类“明语”的读解尚且如此，其对于暗语的读解就更加诡异而莫测高深。

20多年前，黄建新拍的喜剧片《黑炮事件》，讲的就是“暗语”的故事。

赵书信是某矿山公司的工程师，专业精，德语好，且极为敬业。人到中年，仍旧是光棍一条。长年独身使他养成了一个癖好——跟自己下棋。他有一副象棋，伴随他多年，简直就是他的宠物，不可须臾相失。

可是，有一次他带着这副象棋出差，离开旅店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个黑炮棋子落在了他住过的301房间。回公司后，他才发现。于是，急如星火地跑到邮局，给旅店发了一封电报：“丢失黑炮301找赵”。

邮局的发报员断定这封电文是特务的联络暗语，立马报告了公安。公安与这位发报员英雄所见略同，立马立案侦察。赵所在的公司得知，立马将赵调离——赵书信正在为德国专家做翻译，而德国专家正在为WD工程安装进口设备。

公司党委派了一位旅游翻译冯良才接替赵的工作。冯对工程安装完全外行，翻译时连连出错，汉斯又气又急又不理解，为什么用这么一个“二百五”来代替赵。他找公司党委，要求换人。党委坚持原则，岿然不动。李经理到赵书信的住处摸底，无意中发现了他那心爱的象棋缺了一个黑炮，恍然间，有所觉悟。李经理在党委会上说明此事，建议让赵接着担任汉斯的翻译，党委书记周某不为所动。他的想法是，“黑炮事件”还没搞清楚，不能贸然行动。

周的革命警惕性换来了国家财产的惨重损失——冯良才将“轴承”错译为“支架”，在WD试车时，导致轴承全部烧毁。过了几天，邮局给赵送来一个邮包，周书记等一千人将它秘密打开。果然如李经理所说，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黑炮棋子。事情至此真相大白。可是人家周书记还理直气壮地质问赵书信：你怎么能发这样的电报？赵问他：“难道发电报我都不能做主？”这部电影后来获政府的优秀故事片奖。《黑炮事件》成了“阶级斗争过敏症”的代名词。

电文多用省略语，如果赵书信的电文这样写：“我在住贵店期间，丢失了一个象棋棋子黑炮。请到我住过的301号房间寻找，拜托找到后寄我，谨此致谢”，发报员肯定不会神经过敏。赵把这个意思省略压缩成了七个字——“丢失黑炮301找赵”，这个电文就成了除了该旅店的人士，外人都明白的暗语。但是，

即使发报员被阶级斗争冲昏了头脑，经验丰富的公安侦察员也应该从接收电报的单位猜出301的意思，从而把紧绷的神经松下来，不去搞什么立案侦察。即使公安立功心切，一时糊涂，赵所在的公司只要稍事调查，也不会让这个戏演下去。

然而，这出戏还是轰轰烈烈地上演了。发报员、干警、公司党委一千人等不约而同、齐心协力地把一个敬业的高级工程师当成特务，把一封普遍的电报当成接头暗号，这只能归功于当年的宣传教育。这种宣教使国人程度不同地患上了“阶级斗争过敏症”。

一位80后影评人认为，《黑炮事件》不是喜剧，而是加缪式的荒诞剧，导演编出它来，是为了宣传存在主义。我不想反驳他，只给他讲了一个我从清华校友网上看到的另一个同类的故事——

七十年代前期，外省的供应差，北京的商品相对丰富。所以，外省人来北京出差都肩负着为同事亲朋采购的重任。沈阳某设计院的工程师，我们暂且称他为贾工吧，到北京出差，他的同事，人称宝琴姐的，托他在北京买一个铝锅。贾工买好了锅，要在北京多呆两天，就请另一个工程师何工把铝锅先带回去。何工带的东西太多了，想让宝琴姐到车站取走她的锅，于是给宝琴姐发了一封电报。那时候，发电报一个字是三分五厘钱，为了省钱，这封电报简明扼要：“×月×日手举红旗把锅接”。

宝琴姐接到电报后，连夜做了一面纸红旗，按照电报上指定的时间到了火车站。火车一进站，宝琴姐就把准备好的红旗拿了出来，高高举起，摇动示意，以便“手举红旗把锅接”。说时迟那时快，在车站埋伏了多时的公安干警如狼似虎地扑上去，把宝琴姐按在地上。她的那口铝锅，自然也被公安接了过去。

按当时的标准，这家设计院领导的思想觉悟相当落后。他非但没像周书记那样，说什么“事情还没搞清楚，不能贸然行事”一类的官话，反而跑到公安部门，大义凛然地为宝琴姐做担保，保证她绝对不是暗藏的苏修女特务，并对“手举红旗把锅接”的内涵和产生背景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就这样，在关押了几天之后，宝琴姐走出了看守所。（唐金鹤：《手举红旗把锅接》，《昨天》第二期）¹

如果现在还有人这么读解，他就只能进神经病院。■

¹ 唐金鹤：《手举红旗把锅接》，《昨天》第二期。

【札记】

读萧军《延安日记》（四）

——萧军在入党问题上的犹豫与矛盾心理

胡庄子

他说：我是决不能作别人的助手而出现的。（43-8-3）

他对自己的夫人说：我不禁止别人做党员，但我决不要一个做党员的老婆。
（42-9-5）

他说：虽然你们党人几次给我伤害！但是我原谅它啊！因为它还年轻。我懂得共产党也懂得共产党人，但是它们并不懂得我啊！我是一个作家，我只有含着泪帮助它们生长……（40-9-2）

他说：实在，我对于他们这些“党人”，失去了兴趣。……此后我对于一些党人们要采取戒备和不即不离的态度，也不必和他们为难……（41-4-17）

他说：我希望革命成功，愿意他们生长……但我在这里却是生活不惯的，我要离开这里去帮助他们，在这里尽可能给他们教育一些人……走罢！走罢！我不是这里的人，我具备着和他们有着不容易调和的矛盾……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里是没有作家存在的，有的是政治和军事与技术。他们需要这，我只好走……我不能在这里。让他们走自己的路，未来历史裁判我吧，我对历史裁判是没兴味的。（41-5-12）

他说：我们各自贯彻自己的原则好了，组织既然不尊重我，我也决不再尊重它，它对你们也许有绝对权力，但对别人是不行的，……不管是弄到哪里去，我要执行我的原则，我是没有组织力量做后盾的，有的只是我自己的一条生命。
（41-5-27）

他说：我从今天更郑重地放下决心，对于共产党一直要保持着沉默的距离，一直到永远。（42-9-5）

萧军身边的许多人，共产党人，他的老婆，甚至王实味等，都劝萧军入党，期间他也犹豫了几次，多次想到加入这个党，最终都放弃或拒绝了。

他说：我知道我入党后会带进一股新的血液，新的气氛，一批忠正和有能力的人将被认识了。以我的意志和精力和经验和忠心……我想我可以无私、不忧、不惧、强健、吃苦、耐劳……明察，果断……我将要并鲁迅与列宁为一人。这不是我的狂妄，是我的自信，是我的生命力旺盛的特征。（42-11-3）

他认为，“我是王者才而非臣者才”。（42-11-5）

他说：我和共产党的关系，虽然他们大致懂得我，但我又屡次伤到他们的自尊和徒儿们，当然是不愉快的。（42-12-2）

他说：我时时也有要做一个党员的冲动，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必的。（43-5-2）他说：我将永远不为既成的势力所容忍的——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我也决定一生和这些庸俗的东西们战斗着。（41-7-31）他说：不要染了一般党人的习气，应该始终抱住为人类的坦白初衷，和一些革命内部的恶劣倾向作斗争。我在外面和他们做斗争——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参加组织的原因之一——不要太顾虑自己。（41-9-29）他说：可以站在共产主义观点从事战斗，但决不加入任何政党。因为我是个作者，没这需要。鼓励好的，消灭恶的，总以人类向上为依归，决不弄私情，不正当的袒护任何政党。（41-12-17）他说：我永久放弃了从事政治的想头，“开会”是我的仇敌。我又被他们选上了，只好任他们去吧，他们全是喜欢把别人的工作算做自己光荣的人。（41-8-3）他说：一个作家参加革命是不容易的，他反革命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有良心的，这不相同一个简单从事政治的人……（41-8-11）他说：我的真心是乐意做一个疏散一些的作家，我乐意做花果山上的猴子，却不愿到天上做弼马温，或者陪着那和尚去西天取经，以成正果。我应该尽可能逃开这“金箍”的。（42-11-21）

他说：我和共产党一些事情是隔着一些距离……我知道，我已经和这党远离了，因为我将要更客观，更久远些为这阶级去服务了，这会引起他们对我的误解，因为他们对我要求的是更狭小和更近的政治目的的服务。我虽然不反对别人如此做，我却不愿如此做，这不合乎真理。我将忍受一切误解和非难，走自己认为对的路罢，我不要求无远见的人们理解我。不要在你所不应该不需要的面前浪费自己的精力吧。（42-7-9）

他说：我终生要作为一个艺术者，入党那会杀死我艺术的生命！我会失了光芒，而变得可厌。我要独立地行走自己的路，等什么时候能把一些可耻的杂念肃

清了，毫无所动了，那对我是幸福。（42-5-8）

他说：中国共产党他们还不懂得作家，也没有真正的尊敬和关心，更不懂该怎样使用，我为什么跳进党里去毁灭自己。他们是为政治，我除开政治还要文学——更大的政治。（42-10-24）他说：这里不是生长我的土壤和水流。……这里是不需要我这样“不取媚”的作家的，这里要的是医生和无言的服从者。我不是医生，我也不能无言地服从，近乎可耻地歌颂。（43-4-30）他说：对于政治我一天天地感到冷淡，关于做一个党员的事，已经冷淡到无视的地步。（43-10-15）他说：如果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战胜了我，我就决定离开边区，如果集体主义战胜了我，我就加入中国共产党。（42-11-18）

萧军坚持不入伙，不作为一个附属者而存在。他说：“我一生将不能随着别人任何指责而行走的，这也就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党员唯一的理由。——我要自己走啊！”（43-3-15）“这是力底世界，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决不低头于任何不正的威力下面，宁可玉碎，不为瓦全。”（43-3-4）

他说：我知道，过去共产党的对我，他们是以党内的纪律、权威……施在一个党外人的身上，这是忘了他们的本分，也忘了对象，以至引起一些无谓的冲突。这是被领导欲所冲昏了！（43-8-27）他说：我不愿做戏，更不愿带上不必要的枷锁，我决不勉强自己所不乐意做的事——比如入党——我不愿为那些“政治家”们去捧场助威，或用自己的掌声为他们做讲演的标点。（44-1-10）

1944年初，萧军赌气，到了乡下，结果，粮食无办法，土地无着落，住居不能忍耐，老婆多病，孩子也病，春节几乎没有吃肉，老婆生孩子是他负责接生的，他连做梦都是做食物的梦，书几乎是没有时间看了，写作也完全停止……。无奈，他要求回延安，继续吃公家的饭。胡乔木去看他，他表态说他准备入党，让乔木觉得不能相信。他在乡下四个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党校三部。这时，他又不想入党了。他说：如果没有十分必要，我还是做一个非党的共产主义者罢，做一个党员，我实在不愿意，也没有这需要，因为我的职业是一个作家。（44-3-29）

萧军在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它的党员问题上，思想矛盾重重，无数次下定决心不入党，又几次心动想入党，最终也没有入党……■

【口述】

冷卫口述（四）：西单民主墙

戴为伟 采访撰写

时间：2013年10月3日上午

地点：冷卫家

受访人：冷卫

主访人：戴为伟

记录方式：录音及笔记

我到北京来上大学三个月后，“西单民主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当然很积极了，老往民主墙底下跑，也认识了一大批民主墙下的新朋友。比如现在大家知道的胡平、徐文立，《今天》的那一伙人，赵振开这伙儿人，王克平。大家都觉得好像志同道合。在一起，互相激发，那种感觉很不一样。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看列宁（著作时），列宁讲：革命对于被压迫者是个盛大的节日。在民主墙下，我真的觉得自己领会到这句话的意思啦。当时我很积极，到处乱跑，连魏京生他们办的《探索》，在一个人家里设的编辑部，我都去过。《今天》、《四五论坛》（等这些办刊的地方），我都跑去。谈得来的，像《四五论坛》，我也跟着他们上街游行，帮他们去卖油印的小刊物。我自己参加一个刊物，叫《沃土》。《北京之春》是北大的小范围（小圈子），太严格了，我们跟北大没关系，挤不进去，所以跟他们没关系。数一数，我介入过的小刊物，也有三四个了。积极呢，就想要跟人家比试比试。这种心态也让我认识一些新的人，比如胡平。我很佩服胡平。胡平的理论素养，我觉得离开贵阳以来，除了韩军以外，这是第一个我认为他的理论素养（高），让我很佩服的。《沃土》里还有一个王军（化名），这个人写的剧本小说，思想很好，极其聪慧的人。这个人的大局观、战略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什么问题一来，人家先站在高高的（认识高度）讲，大的背景怎么看，然后再讲具体的，两三句话就把我们半天想不明白的事给解决掉了。《沃土》里的胡平和王军，让我感到是见到了所谓的一流人才了。其他，像徐文立这些人很实干，魏京生也很实干，但是他们两个人有缺点。如果说思想探索、理论周全，

他们真不如文人的这种民运分子，他们俩更属于实干型。这样也开阔我的眼界，我看到这些怀抱各种问题、各种幻想的人，可以分成两个类别。对认识自己也很有好处，我到底要干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前提就是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激起自己去考虑。

等到民主墙受到挫折以后，大家都星流云散。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受一些革命文学的引导，苏联的文学就不用说了，《牛虻》、《九三年》，欧洲那些小说对我也影响很大。当时我们那个大学里接到了文件：民主墙运动参加者，必须来坦白交代；不坦白交代，退学。我们班上所有参加过的人心惶惶，一个同学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想我就是回贵州了。那个时候，也没有重视文凭不文凭，没有后来想得那么多。我想回去总能找到自己能干的事情。我想象的事业，更多的还是，下面要开始搞改革，我们能不能写点什么，鼓吹点什么，还是文革初期那一套想法。我就没有把在学校里学的这些技术专业当成个什么事。我说我已经做好了，打起铺盖回贵阳，完了嘛！那个同学叹了半天气，没说什么。系里也来找我们谈，但是系里找我谈话的老师，比我年纪还小。中午吃完饭，他跑到我们寝室，“哎——，冷卫，你出来一下”。站在走廊楼梯那里，老师低着头不敢看我，我不提这个老师的名字了。老师跟我讲：“系里面叫我来跟你谈话。”“谈什么？”“——嗯，那个文件不是在各班上都念过了吗？你在民主墙那里也挺活跃的，班上大家都知道，也有同学说了。你参加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你把参加的情况，大概地说一说；系里面，你也知道，文件放在那里，完全不交代，学校不会放过这个系，你随便说一说，就这么回事了……”

这一来就跟我交底了，我就要在那儿耍英雄气，我说：“这些事情，你叫我怎么说？是很多那些组织，我都去看过了，我没参加！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同学。里边那些人我也都不认识。我哪里会认识他们，我一个贵州人，我都不认识。”

“那么，你总得说，你怎么去参加的呢？——”

“这个事很简单，我经常到那个民主墙那里看，他们会贴海报，某月某日星期几，什么什么组织在某处有活动，愿意去的就去，我就按照地址就去了。坐那儿听，高兴了发言，不高兴就不干（不发言）。他们有事的时候，没有人上街卖刊物，我上街去卖，至于他们做（刊物）的是谁，我也没问，我也不认识。”

“那——你跟班上同学还有一起去的？”

“没有。我每次都一个人。”

然后那个老师低着头，啊、啊、啊——“那么就先——这样吧。”

我还在那里耍横：“我能说的这些，不是先这样了，是就这样了。你们再找我，也只有这些，反正大不了就是回贵州嘛。”

那个老师低着头讲：“不至于，不至于——”以后就真的没有再来问我，真就太平无事了。

戴：那西单民主墙持续了多长时间？

冷：民主墙是在1978年11月中，持续到1979年的元月份，只有两个多月。然后是北京市政府把西单那块地方封了。当年那不是个电车总站吗？外面一个灰墙，一直从西单路口延伸到电报大楼那里。这一段墙大概有200多米长，那就是所谓的西单民主墙。

戴：我看过，那时候，我才13岁，我去那里看过。

冷：我到北京上学的那年，30岁。我老往那里跑。然后北京市政府出了个通知，什么这个地方，为了环境卫生，为了观瞻，不能再乱贴大字报了。要贴大字报，到月坛公园去。

戴：哟，还给了一个地方。

冷：给了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都过去看，我能看到的，月坛公园的东门、南门，门口都停着公安的车，车上坐着穿制服的人，当时还是深蓝色的制服。看到像我们这样年轻学生或者年轻工人模样的人，就扭着脖子使劲儿地看。公园里有一个大铁塔，大概是天线塔，铁塔周围有一圈矮矮的水泥墙，这是指定的张贴大字报的地方。那里有穿蓝制服的，《今天》的一个哥儿们给穿蓝制服的起了一个绰号——“蓝毛狗”（他们都戴着栽绒制服帽子）（笑），在民主墙周围的人都有不满情绪嘛。因为好好地就把民主墙封了，大家都不满。“蓝毛狗”这个绰号很流行的，很多大字报都会写“我被蓝毛狗迫害”。蓝毛狗还有便衣，一望便知，那些人也不掩饰，完全就是威慑的状态，意思是你们别在这里弄这些事。结果，开始还有人贴大字报，大概过了10天左右，大字报给寒风刮得破破烂烂，也没人贴新大字报了，但是警察依旧在那里守着，这样慢慢就没有人去了。我去了大概有五六次，一看这样，好了，总是算有始有终了，民主墙就此告终，没有啦。

接下来就是抓刘京、魏京生等事件，很明显，镇压就在眼前。慢慢也就知道，镇压来自哪里，那还能有什么说的？这还不是像北京“四五事件”，可以赖在北京市公安局头上，这时候可没得赖了。邓小平发话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样，这些事情都过去了。读书会，连《今天》这样纯文学的创作，当然要交流文学观，在高压时候，他们也要交流文学观，进一步到探讨社会政治理论。但在当时，《今天》的活动定位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就是个纯文学刊物，赵振开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就搞纯文学探索，贺敬之式的文学已经死了，从内容到形式，要新生新的文学形式。这些理论也很革命，但它有限定——就是文学。所以我对《今天》也有兴趣，跑去很多次，跟他们那些人都混得很熟。但是《今天》对我的吸引力不如《沃土》或者《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对我那么大。因为他们抱定的社会政治宗旨，我觉得那个时候跟我的思想更合拍，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会更密切。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读书会就是民主墙的前身。我的经历是在贵阳，从红卫兵到知青，从知青进读书会，然后发展到四处去找同类。其实（全国）所有同类，发展情况都差不多。贵阳当年还有一个小团体，民主墙是外省到贵阳来最先闹的，“新星画展”就是在他们那里先发起的；有了他们闹，才有了北京王克平等这一批美术爱好者跟上。当时美术馆要搞展览，（上级）不让办，在外面小花园办。办了一天，就有警察来撕扯外面挂的画。差点闹成冲突。

贵阳“新星画展”这拨人也是一个读书会，他们最初聚在一起的动机很简单，——学英语。大家都觉得，列宁会4门外语，马克思会多门外语，周恩来会英语、日语，据说还会法语，我们也得学外语。想学外语，一个没有说出来的重要理由，——想看原著。国内翻译能见到的信息太少了。当时有本很流行的书——《和平的反革命》，这本书是肯尼迪总统的国安顾问写的一本书。这是本半回忆录、半政治理论。当时这本书在各个读书会里盛传，它的核心理论是发展和平演变，针对的对象是苏联。肯尼迪在的时候，苏共的二十大、二十二大刚刚开过。他们就希望引导健康力量，希望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全部走向公开化、自由化。因为讨论这样的问题，这个书就被管得非常紧了。我们大家都是口耳相传，见不到这本书。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讲，会英语就好了，会（看）原文就好了。但会了，到哪里去搞到资料，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的障碍是懂外语。

刚才说的这拨人是从学外语开始，以后人就分化了，有一拨人真的就是只学外语，后来变成贵州各个出版部门的急先锋；另一部分人就开始讨论，学外语，能搞到手的文艺类的书多一点，大家看着，对文艺有了兴趣，开始讨论文艺理论的问题，或者有喜欢画画、写诗。正好学了英语去读彭斯的诗，美国惠特曼等等。

一开始学英语，30多个人挤在一起，最后也都分化了。但是它说明一个现象，文革和上山下乡，让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地睁开眼睛。以前是闭着眼睛接受洗脑：“五一六通知”我们坚决拥护，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然后林彪那个题词：听什么话，读什么书，做什么好战士……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我自己在学校里高一的时候，写入团申请书，一直是雷锋说的（那样），——队团党，入队、入团、入党，人生三大里程碑。我的奋斗目标就是这样，完全是这样想的。

让我们这样一代人觉得，原来这样一些话，都是不真实的。怎么会这样想起来？外面的因素是文革、下乡；内在的因素，我觉得跟家庭环境处在边缘，家长是可以被推一推，（或者）拉一拉，我们这帮人就是候补狗崽子了（笑），随时可能被一巴掌打到那里去。我那个班主任要批判我，就很想给我扣一个反动学生的名目。这个名目扣下来，现在回想，那可真就不寒而栗了。幸好当时我们班上的团支书，一个女生，她对我也不了解，她只是觉得，怎么可以随便把一个同学打成反动学生呢？学校不是一个红彤彤的阶级团体吗？我们团支部不应该是一个革命大熔炉吗？把思想有问题的同学，废铁也得炼成好钢啊！（她决定）不能这么批判。团支书反对，班主任就没辙了。

那个时候的苦闷，或者问题，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跟今天的“左愤”是一样的，可能在实践上比他们更彻底。

这些内外因合在一起，让我们敏感起来，就感觉理论和现实的不协调；我看到的人，他们嘴上和行为的不协调；然后进一步认识到，我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不协调；响应号召和内心冲动之间，有极大的落差。这些问题憋在心里很难受，就得去读书。以前没有想到，看到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马恩的那些著作等，他们的逻辑极其严密，把这些著作和毛选来比较，就发现文风很不一样。毛泽东语录都是那种，什么我们要反土豪劣绅，说我们是暴力，我们就是暴力。马恩绝对不会这样讲。毛泽东会有非常专横的那种语气，对于什么土豪劣绅，我们就是要斗一斗、清一清、算一算，什么踏上千百只脚。文革时期，我们写大字报，也

都是这种语言。看到马恩那种要讲逻辑，要讲实证，后一句话，前面一定有充足的逻辑基础，才能这样讲。特别重视逻辑，包括辩证法，它的基础就是逻辑，必须满足充足或者必要条件，才能推进一步。当时觉得很不一样。

后来多看一点，就发现，马恩的思想，有很多希腊传统，至少马恩从来不会认为民主是坏事，不会像今天讨论说的那样，凡是宪政、民主全都不好；最后上升到说，只要是西方的文化思想，就一定是不好的。这个连毛选上都不会这样讲了。毛选老在讲，先进的中国人，在国内找不到思想资源，怎么办？只有向外面学习，以俄为师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开篇讲的那大段话：先进的中国人是前赴后继，要向西方寻找思想资源的。怎么到现在，他的继任者都认为西方思想就是不行！什么行，中国回到那里去？那就要回到军阀时代，尊孔读经。实际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后来看到陈独秀的话，陈在五四的时候1919年写的文章讲的很尖锐了：在今天的中国，谁提倡尊孔读经，谁就是无产阶级被压迫大众的死敌。陈独秀在要建党的时候，讲得这么明确了。我在想，历史真的是今天的借鉴。在学习中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我们完全习而惯之的那些东西，只是洗脑，经不起逻辑检验，而且不能对照。看看毛选四卷，我们共产党就是个民主的党；接见美国记者时毛泽东讲的，美国的民主是今天世界上最好的民主，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美国式的民主。现在讲这个话，那不是完全的民运分子了？

可见，讲内在的矛盾，其实就在中国建国这一代人里。今天说的伟大领袖，毛左那么推崇的人，他都不敢像今天的毛左，这样直接攻击（民主）这种东西。就是他们的思想资源，他至少还要保留。毛泽东思想哪里来的？西方来的。因为它的前面是列宁斯大林，再往前是马克思恩格斯。我们都知道列宁给马恩讲的三条，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哪一条都是欧洲思想文化的精华。像今天的这种现实，我觉得用陈独秀的观点讲，那只能认为是大倒退了。倒退到连毛泽东不得不承认的事，今天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承认了，更别说我们当年那种探索。

当年我们就算走得很远的了。站在今天这个年纪，好像比起二三十岁的时候，见的世面更多了，我也觉得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但是我从来不觉得这种探索是错误的，相反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不光是我自己，我觉得后来的四五运动，民主墙，凡是跳到前头的那些人，我跟他们接触多点，我知道这

些人大多数都有读书会的经历。所有在民主墙下出现的民刊，更早年，在文革期间高压之下，它都是用我们那样的业余读书会的形式来维持的。《今天》是这样，《四五论坛》也是这样。胡平在四川，考到北大来读研究生，他那里也有这样的读书会。后来我碰到些郑州、长沙、南京、杭州、武汉、上海等等出来的朋友，处处都能碰到说：“啊，原来你也有这个经历！”

让我最感动的是，1998年到西藏去，当时的任务是给西藏党委写那种改革开放新西藏这样的主旋律电视剧。下去采访，碰到几个人，他们讲当年，文革期间，他们也是一个读书会。哎呀，那次变成不是采访，大家互讲自己读书会的经历，大家都兴致很高（笑）。我才发现，读书会不单是我个人的经历，它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当然绝大多数的红卫兵不会这样去想，最后，绝大多数人都陷入生活的困难：我要找工作，我要找女朋友，我要考大学，最后就是我要想改变社会底层的身份等等，这些东西够折腾一辈子了。那么红卫兵、知青这一代里面，参加读书会的肯定是很小的一个少数，但是另一方面，它在全国那样广泛，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以前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我们要到株洲去找韩军的时候，觉得可能全中国就我们这几个人思想最先进了吧？（笑）就是愚蠢到那样的地步。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读书会这样一个现象，它可以为历史研究带来这样一种意义：有一代人，从糊涂、混沌，到觉醒。它可能代表了这个趋势。以后民主墙下闹得厉害的那些人，都是从这个圈子里出来的。■

【述 往】

献给“三线”的青春

李南央

极小的群体

也许我孤陋寡闻，老三届中有一个极小的群体的经历似乎从未见诸文学作品——分配到三线工厂的66届毕业生。这部分人在全国老三届中有多少，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较肯定地说，在北京的数目大概超不过两千。我就是这个极小群体中的一员。

记得是在1967年的九十月间，北京的工厂和服务行业，还有一些外地的工厂在北京的中学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招工，分到我所在的北京女十中的名额是北京第二外文印刷厂工人一名，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一名，青海冷湖机械厂工人两名，陕西汽车制造厂工人七名。

陕西汽车制造厂是由当时的北京东方红汽车制造厂，也就是现在与美国合资的北京切诺基汽车厂的前身包建的三线工厂。工厂在陕西岐山县辖区，位于秦岭脚下，最近的火车站是二三十里外的蔡家坡。在招我们这批北京学生时，工厂还只是一个构想，连图纸都没有设计出来。

进厂后知道了，我们这一批陕汽学员一共是1500名，都是北京66届初三、高三毕业生，这其中有北京顶尖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也有崇文区、宣武区男女混校的学生，初三毕业生占了大多数，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是六比四强。招工时毛泽东的“五个面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艰苦地区”）的指示还没有下来，除了极少数的中学生自找门路，豪情满怀地去了西藏、云南和北大荒，大多数的在校学生还做着升高中、升大学的梦，没有人想到整整六届中学生会被连锅端出学校大门，根本没有了直接升学的机会。因此对这次招工，同学们的反应很冷淡，除了北京的两个名额小有争挤外，外地的两个工厂连二里挑一的局面都没有形成。结果我这个出身有极大问题，本来并不符合三线工厂条件的人居然被陕西汽车制造厂录取了。

这还得感谢当时学校的解放军。1967年底时，上边还没有可以斗学生的政策，虽然我是学校“四三派”的头头，总跟军宣队的意见相左，闹得他们头大，却也奈何我不得，能把我早早送走无疑对他们是一种解脱。大概军宣队不但极力推荐了我，评语也写得不错，否则我不会不但被录取，还在给学员办的进厂学习连队里被指定当了一名连长。

本来我们这批学员应该是在1967年的11月报到进厂的，因为“北红汽”发生大规模武斗，入厂日期被推迟到1968年的2月15日。岂料我离校两个月后，北京中学就掀起了“抓坏头头”的运动，二十五中“四三派”的头头侯禹还被关了起来。待女十中的军宣队回过味儿来，后悔不迭地赶到工厂来抓我回去接受批判的时候，我已经到青岛培训去了。也许那时军宣队还不具备到外地抓人的财力和权力，并无人追到山东，我得以逃过一劫。

一开始就有人自杀

我的家庭中没有当工人的，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中也没有，我对工厂的印象全部来自电影。当我站在“北红汽”的厂房顶上，看着在中饭电铃声中从各个车间大门潮水般涌出的满身油泥、腋下夹着饭盒的工人队伍时，激动得不能自己，觉得那一幕和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中看过的竟是一模一样。

不过这种激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很快我就发现领导我们进行进厂教育的两个工人简直就是痞子。后来才知道因为他们是占了上风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才被派了这份清闲的美差。我得了结论：工厂的造反派肯定和我们学校的不一样，保皇派中好人多，而造反派中是不好的人多。我因之很快和他们发生了冲突。这位代表工人领导我们学习的学员连负责人，立即向学员们宣布了我的“反动家庭出身”，在分配工种时，将我原定的铣工，改成了被视为最糟糕的工种——大型冲压工，让我第一次领教了穿小鞋的滋味，开始懂得“社会”这两个字眼的含义。

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入厂教育下车间前，底盘厂的学员中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名来自男六中的学员在厂房顶上喝敌敌畏自杀了。为什么？没人知道。难道是因为社会令我们这些学生根本想不到的“黑暗”让他绝望了吗？

下车间不久，又有一个来自女五中的工具厂的学员自杀了。她出身不算好，但是也许和车间领导的关系搞得不错，被领导送到人民日报社当工人通讯员。据说她原以为可以留下去的，但结果因为家庭出身不是纯红色而被退了回来，她因此而绝望了。既然如此不喜欢工厂，当初为什么会报名呢？想来也是进了工厂方知现实中的一切并不像幻想中的那般美好，本以为迈上了跳出“黑暗”的踏板，却又被送回了工厂，因此而受不了，轻生了吧？

这两个学员的名字我当时不知道，也不知道1500名学员中现在还有什么人叫得出他们的名字。只是这30多年来，我从未忘记过他们的曾经存在，常常叹息：多么大的失望才能让他们有如此的决心，在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时就自己结束了它。

虽然对工厂和真实中的工人阶级的失望极为深刻，我自己却从未有过一丝的怀才不遇或者无法忍受现实之感。以我“漆黑”的出身，能够进入制造炮车的三线工厂，已经是十二万分的满足了。我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尉凤英那样的工人工程师。尉凤英是冲压工，我能也当上一名冲压工，似乎离理想更接近些，因此并不沮丧。

诗情下的画意

经过在青岛汽车修配厂10个月的培训，又返回“北红汽”过了一年多的学徒生活。我们车间第一批赴陕汽的学员和工人在1970年的7月来到了秦岭脚下的陕汽厂，我也在其中。

厂区窝在一个山沟里，沟底是一个村庄，穿过村庄向上是林场，然后就是秦岭山脉。沟的两侧是三丈塬和四丈塬，诸葛亮仙逝的五丈塬连着四丈塬抹过沟口，进沟时向左抬头望去，就可看到立在塬边边上的诸葛亮庙。初到时，以为我们是三面环山，待第一个公休日爬上一侧的“山”顶，方知那上面是方圆几里，展展的平地。这才明白老乡何以称它们作塬而不是山。老乡的村子属曹家公社，散落在沟里，和我们后来建起的厂房并没有什么物体的隔离，这种布局给日后胆子越来越大的农民偷窃工厂物资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沟儿的名字叫麦李西沟，一条小溪顺着沟中间流淌着，春天油菜花，李子树开花了，满沟飘散着清香，绿绿

的麦田更令山沟充满了温馨和活力。早晨推开窗户往沟底的方向望去，石楼山的歪顶被云朵缭绕着，深深地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胸膛里已是充满了幸福。晚上我们在宿舍楼顶上开会、学习，萤火虫尾巴上的灯点亮了，绿色的珍珠般的亮色围着我们绕，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萤火虫，觉得生活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我从一开始就爱上了这条山沟。

刚到时，沟里只建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男女学员混在一个楼里，一层住着一个车间的第一批学员，西头为女生，东头为男生。后来又有三栋楼陆续建好，才分出了男生楼，女生楼。刚刚住进楼房时，楼中并没有通水，全楼的人都要到楼外的一个水龙头提水，还有一个锅炉房，有四个管子从墙的底部伸出供应热水。到楼下提水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是用过的脏水却没有人愿意再端回去倒，于是从窗户里往外泼脏水成了一景。以后楼里通了水，习惯却已成为自然，虽然各车间发动了多次运动，企图用道德的力量杜绝这一恶习，但终未能根绝。

因为无水，楼里的厕所也不能使用，要到楼外的简易茅房方便。解大手别无选择，必须下楼；而解小手，晚上从酣睡中被紧急憋醒，特别如正值寒冬季节，有谁会觉悟高到跑到楼外去解决问题呢？因此在清晨从窗户泼出的水中，就又多了一些不洁的成分。幸运的是我的宿舍在最高的四楼，虽说为了符合毛主席备战备荒、节约闹革命的标准，四楼顶上仅仅反扣了一层水泥槽板，这槽板在夏日的白天吸足了太阳的热能，晚上便无情地释放出来。当楼下住的人被山区夜晚的寒气逼得盖棉被时，我们这些四楼居客却热得在床上烙饼，整夜不得安睡。尽管如此，相比污浊的瀑布时时不期而落的危险，住在四楼算是占据了最有利地形。

时间过去 30 多年了，那个年头的情怀和心境还是用当时的语言表达方为贴切，这里就录下我所在的车身车间学员们的三件旧作品吧：

忆江南·西沟

西沟好，碧翠掩红楼。今日汗流挥作雨，他年战备车如流。能不爱西沟？

忆江南·望石楼

依窗望，伴友眺石楼。日照云飘疑仙境，仙境还需妙手修，“好景”在西沟。

青春献未来

海是我眼界，山是我胸怀。跟着毛主席，青春献未来。

诗里描述的“碧翠掩红楼”，其实说的就是宿舍楼下污水横流的情景，因为作者年轻人浪漫的诗情，那本不堪的肮脏竟具有了画意。污浊且具丰厚“肥料”的常年积水，特别是楼房背靠山塬的一面和上从塬上冲刷下的泥土，成了动、植物们的理想家园，它们在红色砖墙的宿舍楼底层造出了一片环绕的碧翠。这绿色让住在一楼人的窗户常年不能打开，因为如此恶臭便会立即冲进屋内，蛆虫们也会蠕动成队伍入室做客。我们那时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突击日，任务就是清理淤积在楼背后的肮脏泥塘。说是清理，其实不过就是把那些绿色的东西从楼底挪到防洪护坡上的塬底，给它们搬搬家。这层绿色能有多厚？说了你也许不信。我们车间有一个外号叫八级的钳工学员，一晚从四楼的窗户跳下自杀，落在了这层绿东西上，楼下的人听到有呻吟声，出楼察看，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八级，他竟然除去碰伤了一条肋骨，别无大妨。

三首诗中的最后一件“作品”是本人的。几年前遇到当年另一个车间的陕汽学员，她竟然还记得我这首打油诗，告诉我她从这首诗里看出了我的不寻常处，说得我很是飘飘然了几分钟。

遭遇谎言

跟我们第一批赴陕汽的学员一起进沟儿的，还有一些“北红汽”的老师傅。我们这些学员毕竟还未出徒，对如何制造汽车知之甚少，需要技术较高的老师傅的带领。这些老师傅当年其实也不过就是三十郎当岁，可是有了家室的拖累，心境和我们这些无牵无挂，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小青年自不能相比。

为了动员老工人去陕汽，当时驻“北红汽”的军宣队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奔赴三线动员大会。会上很多老工人争先恐后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底盘车间一位工人不但流着热泪高呼支援三线的口号，发言完后还迈着正步，一路高呼着“我要去三线！我要去三线！”走下台去。尽管觉得不少发言人很有些做作，但是我还是为他们表现出的觉悟所感动。

没想到开完会往会场外走时，和我同工段当工人的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撇着嘴说：“别看他们说得好听，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会去陕汽的。”我当时几乎有一种对他猥亵了这些工人纯真感情的愤怒，我说：“你怎么知道？这绝对不可

能！”“不信，走着瞧。”他不想跟我争辩。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对的！所有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过言的人，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大红榜上。后来才有信息传出来，那些发言的人都是领导事前布置好的，已被告知他们绝不会进入走的名单。这个谎言对我来说是太残酷了，把我心中仅存不多的对工人阶级的美好感情彻底打碎了。

我的师傅刘贵也在第一批赴陕汽的工人名单中。刘师傅在动员去陕汽的工段会上表态，一定响应党的号召，奔赴三线。散了会，我很高兴，因为我师傅的技术极高，人也善良，能有师傅和我在一起，心里觉得踏实。可是又是那个大学生对我说：“你师傅不会去的。”我说：“不可能！”言外之意，我师傅可不像那些说谎的小人。

这次他说对了一半。师傅没有按日子和我们一起出发，拖了大半年，但是最终抗不过以“停发工资”相挟的组织，终于还是去了沟儿里。我哪里能够体会师傅的难处。师傅老说他是“千顷地里的一颗苗”——他的爷爷是独子，他的父亲是独子，到了他这一辈，还是独子。师傅的爷爷、奶奶，父、母亲那时都还健在，全是北京远郊区的农民，他自己膝下还有两儿两女，最小的刚出生不久，大的才上小学。这四老四小的一大家子，师傅一走，就全靠师娘一人支撑。这其中的艰辛、寒苦和悲酸，那时连饭都不会做的我，如何想象得到！

师傅到了陕汽，申请工会救济和行政借支成了家常便饭。可是工会救济的原则是“救急不救穷”。师傅家里不死人，没病人，就“不急”，申请多半不获批准。行政借支，家在北京的老工人几乎都有困难，不能每次都摊到师傅头上。师傅常常因为家里老人或孩子出了事，赶回北京。花路费不说，请假还没有工资，更是雪上加霜。我真不知道那些年月师傅是如何过来的。

几年后，工厂来了一个陕北的老干部——杨书记，他下了个大决心，凡家中有困难，支援三线来的北京老工人都可以申请回京。他真是老师傅们的“杨青天”呵！直到今天他们提起杨书记，还是感恩不尽。我师傅终于回了北京。但是一直到多年后，四个老人相继辞世，儿女们长大工作，他才渐渐还清了行政借支，生活有了些起色。如果说，西沟儿的生活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充满了浪漫的诗情，对于这些老工人则更多的是苦涩和无奈。不过没有人发牢骚。一来那时的社会共识是：三线建设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党和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大河水满，小河涨，没有国家，哪有小家？很少有人质疑过在山沟里建厂的荒唐。二来，即使有牢骚，敢发吗？说了让人听见，轻则被认为是落后，重就有破坏三线建设之嫌了。其实“小河没水，大河干”才是真理。但是那个年月，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教化下离真理太远。我因为没有看出三线战略的荒唐，所以没有不理解的苦恼，反而因为远离了专制的母亲，只感受到在沟儿里十二万分的解放和愉快。

“三边”方针

陕汽是那个年代毛泽东“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三边”方针的典型产物。我们车间第一批学员到达西沟儿时，厂房连地基都还没有，车间是刚刚收了麦子的庄稼地。车间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我们这些学员就和宝鸡建筑公司的工人一起建设自己的厂房，有的时候连续24小时突击挖厂房支柱的地基坑。真是年轻啊，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们车身车间因为有大型冲压机，在从北京来的车间主任的坚持下，厂房是水泥支柱，钢梁，砖墙。可是驻厂的军代表说，三线厂怎么能体现大庆精神？结果硬是将底盘车间盖成了“干打垒”，还没开始正式启用，墙体就裂了缝，只好墙体外又加砌水泥，造价比正常设计高了一倍。不过军代表算的是政治账，没人敢用经济账和他们论个高低。军代表还有更绝的，说是使用冲水的厕所“太修”了，楼房设计让采用农民的“干厕”。可是楼上“干坑”的粪便如何向楼下排放？估计是设计师们实在想不出方案，向军代表要主意，他们却只具革命精神而没有革命智慧，也拿不出什么高招，结果宿舍楼得以保留了冲水厕所。但是我们的车间则没有设计厕所，工人们要方便，需到车间外面的“干厕”解决。几年前，我和先生带着女儿回了趟沟儿，车身车间竟然还保留着“干厕”的格局。军代表终于给陕汽留下了一点“革命传统”。

陕汽的产品当年是单一的五吨越野炮车，我们进厂时仍在“三边”之中。到厂大概一年多后，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大名鼎鼎的孟少农到沟儿里来当了总工程师。他立即提出了要民用、军用并行，发展多型号、多车种的建议。但是他竟然不被见容于北京来的副总工程师，几年后被排挤到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在那里他的才华才得以施展。

记得我在厂办“七·二一大学”上学，孟总是我们的校长，给我们讲课。他谈到中国特色的设计，说：“什么是中国特色？难道把汽车的尾灯设计成红灯笼就是中国特色？”那个年代，说出这种实话、真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到陕汽的第四年——1974年，第一批车，记得是四辆样车造了出来。车身的大部分部件是靠钣金工敲出来的。全厂几百号职工造出四辆车，这种“业绩”大概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可仍以为“自豪”的。

咋吃给牲口吃的东西

岐山县靠近关中平原，虽算不上十分富庶，但是风调雨顺，很少灾害，农作物以小麦为主。老乡主食是面条和馒头，但不懂吃菜，所以辣椒、盐、醋，外加一点生洋葱是当地农民的副食。老乡家的面板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擀面杖很细，只有北京人用的擀饺子皮的小面杖那么粗，但足有半丈多长。守着这么个出小麦的地方，政府却不许工厂从当地买粮，一定要吃国家统一调拨的粮食。结果我们的主食成了细、粗掺和，粗粮为主，而粗粮有很长时间又是以高粱面为主。食堂怕纯高粱面的窝头卖不动，就将白面和高粱面和在一起做，做出来的馒头黑里透红。如果高粱面是新粮，应该并不难吃，但是国家统销的粮食一般都是三四年的陈粮，因此那二面馒头的味道极差。我们只有在过节、过年才见得到纯白面馒头。如果有一天食堂做高粱米饭，便会出现空前的盛况，那场景常常让我想起电影《乌鸦与麻雀》中从人头顶上爬过去抢换金条的镜头。

机修车间的男女学员非常团结，不像我们车间男女界限极严，很多年，男女学员间都不能正常说话。卖高粱米饭的那一天，若让机修的男学员抢到了最前面的位置，我们就惨了。那几个男学员扒住卖饭窗口的木框，坚守住阵地，后边的女学员将饭盆一个个地递过去，盛满了高粱米饭后再一个个传出来。不管我们在后边如何抗议，他们只是充耳不闻，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女学员离去。如此一番，如果我们排队的位置稍微靠后，轮到时则只有那黑红馒头可买了。

主食如此，副食就更困难。有一年的春天不知何故，突然断了蔬菜来源，食堂连白水煮茄子都做不出了，好几个星期只有咸菜汤卖。我们就出去挖野菜，男学员们会想法儿去逮青蛙。有一次从山里跑出了一只迷途的野鹿，车间的男学

员加老工人围追堵截，最后将那只可怜的鹿抓到手，杀了、吃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残忍。可是那时候大家馋呵！

当地老乡似乎比我们强，每年宰一次自家养的猪，他们会用醋把大肉做成臊子，用瓦罐装起来，吃面的时候挖出一点拌在里边。省着吃，可吃一年。我们这些拿着城市户口，住在农村的三线工人的大肉供应却成了问题。粮食有国家从外地调给我们，可猪肉的统销却没有把我们这些沟儿里人计算在内，因此厂食堂肉的供应完全没有来源，需要工厂领导自己就地设法解决。开始用钱还可以向当地的公社或者县里买到猪肉，可是他们很快就学习了。国家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不供应农民，工业用材就更没有农民的份儿，当地政府要买点儿水泥或钢材什么的，连管这些物资的衙门口朝哪儿开都不知道。感谢毛主席的三线政策，把工业材料送到了农民家门口，哪有不利用之理。

想吃肉吗？好啊，没问题，拿水泥和钢材来换。

厂领导刚开始还抗着，说是专材专用，工厂没有权力把国家调拨的物资私自出售给地方。

行，你不给是吧？我也不给你，看咱们谁抗得过谁。

全厂几千口子人，又大多是年轻人，活儿重消耗大，天天吃没有油水的白水煮菜，还时不时地喝上一阵酱油汤，厂领导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开始到了过年时，咬咬牙，匀出一些钢材给县里，换来一人两毛钱的肉票，让大家解解馋。后来干得多了，也没见上面怪罪下来，用水泥、钢材换肉也就经常化了。食堂得以每月发出一两次肉票，我们可以每次买上两毛钱的红烧肉开开荤。

全厂一共有四个食堂。沟儿里边的总装、车身、机修、工具和热处理车间共用一个食堂，叫沟儿里的食堂，在这个食堂就餐的人最多，伙食也最差。位于沟儿中段的底盘、发动机车间和厂办公室共用一个食堂，叫发动机食堂，因为有厂领导就餐，伙食要比沟儿里食堂好。沟儿口有个食堂，是为建筑公司在沟儿口办公的干部办的，但是厂车队和厂基建办的人也在那里就餐。只有位于沟儿口外延处五丈墩下的铸工车间有自己单独的食堂，归铸工车间自己管理，而不是像其他三个食堂那样由厂后勤科统一领导，因此伙食办的要好得多。食堂大师傅粗粮细做，夜班还有面片汤吃，铸工的人从来没尝过沟儿里食堂那种黑红馒头的滋味。不但如此，铸工车间还最先有了浴室，工人宿舍设在办公楼里，冬天有暖气，他

们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最绝的是，他们的领导竟然真能兑现当时一机部的工种补助标准，给每个第一线的工人在曹家公社弄到每月2斤猪肉、半斤白糖，半斤油的特殊供应。那时如果沟儿里车间的姑娘和铸工的小伙儿交了朋友，大家就开玩笑：“是不是那两斤肉、半斤糖勾的？”

我的丈夫巴悌忠当年是铸工的炉前工，和他交了朋友以后，每个月可以吃上几次肉丝炒饼，算是生活中的一大乐事。生活在沟儿里的九年中，我自己只得到过一次曹家公社大肉供应的殊荣。那是在曹家公社办公室和悌忠领到结婚证的同时，领到了一张两斤的肉证。办事员在结婚证上盖了公章之后，随手将结婚证翻过去又拿起一枚长方形章扣在了背面。拿过来一看，是“肉证已发”四个字，让我们哭笑不得。好在这四个字被盖在了结婚证的背面，如果办事员把图章盖在正面，我们当时是否宁肯放弃这二斤肉而不愿留下这不雅的印记，现在是不得而知了。

后来县里在沟口办了一个小商店，有时会卖些饼干。说是饼干，其实就是无油少糖，碱大得不得了黄味味的小干片。我们给这种饼干起了个名儿叫“脚后跟儿”，其粗糙程度可想而知。但它毕竟是细粮做的，只要有钱，还是愿意一毛两毛地买来解馋。

再后来建厂初期大力提倡的艰苦奋斗意识渐渐淡薄了，人们开始琢磨自己做饭改善生活。不知是谁最先发现了曹家公社的商店虽然什么吃食也没有，可是有煤油卖。于是大家开始托北京的家人买煤油炉、挂面、酱油膏，有的家长还从自己的口中省下肉票，给孩子熬了猪油。但是如何带到沟儿里却是个问题。出师后，我们每年有15天的探亲假，可以自己随身带些东西回来。酱油膏一次带够一年用的没有问题，可挂面和其他食品能够坚持两个月就不错了。于是学员们互相帮着带东西，这样可以保持小锅饭常年流水不断线。

麻烦的是蔡家坡是个小火车站，北京过来的车在这里只停留两分钟，而且车站的政策是每个旅客只允许带两件行李出站。家长们把自家的手提袋给探完亲回沟儿的人送到北京站没有问题，但是车到蔡家坡，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众多的手提包卸下火车并且混出车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极像一场亚战争。记得能耐最大的是我的好朋友赵健民和她现在的丈夫、当时的男朋友王槿长这一对，最多的一次他们竟带回了四十多个手提包，这些手提包整整占据了一个车厢一侧

的行李架。赵健民的亲和力是一流的，火车开出北京不久，她已经是全车厢所有人的朋友了。车到蔡家坡，只见一个窗口探出了赵健民的脑袋，一声“我在这儿！”的呼唤，散落在站台看得见、看不见处稀稀落落的人影顷刻间汇集成巨大的一群涌到了那一节车厢，只见靠站台一面的车窗已全部打开，在赵健民的指挥下，靠窗的乘客们把一个个手提包交到了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中，不到两分钟，四十多个手提包倾卸一空。赵、王二位忘不了向侠肝义胆的临时朋友们一一道谢，在火车即将启动的瞬间跳出车门。又是顷刻之间，还没等车站的检票员醒过闷儿来，这一群疯狂的蚂蚁已在与车站连通的小巷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赵、王二位各提着两个手提包，挂着一脸无邪的微笑出现在检票口。

渐渐地，老乡的胆子大了些，我们的小锅饭供应品有了就地开源的可能。他们会用自家产的鸡蛋和菜油和我们换粮票、换钱。可怜老乡们生怕被干部发现，割了“资本主义尾巴”，鸡蛋偷偷藏在篮子里用布盖着，待我们走近，悄悄问一声：“换鸡蛋么？”我们就把他们领到宿舍的楼道里进行交易。其实老乡的生活要求实在是低，他们做馒头连碱都不用，面发得恰到好处，吃起来略带点酸，非常可口。跟我们交易无非是闹点零花钱，买个针头线脑、盐面儿什么的。

即使如此，当地老乡的生活比起甘肃的农民要强多了。每年夏天，蔡家坡的火车站里就挤满了甘肃来的“麦客”。当地的队干部到火车站去选自己中意的“麦客”带回家，管吃管住，帮助村里收麦子，工钱是没有的。麦收过后，麦客们背着一袋袋从口中省下的，晒成干干儿的白馍，心满意足地又扒车回去了。年复一年。到我们来了后，沟儿里的老乡不请麦客了，因为有了我们这些支农的工人，不用管住，只管中午一顿饭。

那年我去帮助老乡收麦子，中午老乡用刚收下的麦子磨了面，给我们蒸了馍。我一辈子没有吃过那么香的馒头，一口气吃了四个，足有一斤多。老乡还用豌豆给我们熬了水解暑，我们喝了汤，末了儿还把豆子都吃了。老乡笑我们：这些娃儿真傻，咋吃给牲口吃的东西呢？

丰富的业余生活

一千五百个年轻人聚在一起，生活是不会寂寞的。我们比插队的同辈们幸

福得多，一年劳作下来虽说吃的是粗粮和缺油少味的熬菜，但是我们毕竟有现成的饭吃，不用为拣不够烧火的柴草犯愁，不用自己推磨碾面，不用为口粮不够饿肚子。下了班，吃完现成的饭，还有的是剩余的没有使完的劲儿，车间和厂一级工会组织成了我们大家的最爱。厂工会年年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联赛，文艺汇演。我们厂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的一台节目，舞蹈《工厂民兵》，《乒乓传友谊》，《小簸箕》，《送弹药》，《长征路上》，歌舞剧《青年突击队》，就是现在拿出来，其艺术性也不逊色于当下舞台上的作品。铸工、发动机和总装车间还盖了灯光球场，后来又有了游泳池。厂篮球联赛时观看人之踊跃，观众情绪随着比赛进程的跌宕起伏，绝不亚于看一场世界级比赛。要是有蔡家坡的西北机械厂或陕西棉纺九厂这些外厂球队来比赛，那就更是沟儿里盛大的节日。全沟人早早出动，都试图占据有利地形，开赛时连塬坡上、车间顶上都会站满了人。

最值得记忆的一次是为参加全国运动会，陕西省临时组织了女子排球队，听说岐山县有这么个聚集了1500名北京学生的工厂，觉得定是人材了得，特意到西沟儿来锻炼队伍，和我们厂的男子排球队打了场比赛。虽说总比分是3比0，我们的男队被剃了光头，但是每局都有个争头儿，实在是那个年月难得欣赏到的一次空前赛事。

我当年是厂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的成员，还当过一届岐山县女子排球队的队员。有一年实行拉练，又恰值中国开展了乒乓外交，县体委把我调去参加了县乒乓球队的拉练队，到农村去进行乒乓球表演，试图掀起岐山县人人学打乒乓球的热潮。一日行进到一个农村，没有招待所，住在老乡家。老乡家的被子里面都是黑色的，从新用到破从不拆洗，被头油亮油亮的。我怕有虱子，将内衣裤的口用鞋带扎紧就钻了被窝。睡得迷迷糊糊中被哭声弄醒，一看是睡在我旁边蔡家坡西机厂的那个杭州姑娘，她和衣坐在枕头上看着黑黑的被头，将腿伸进被窝，又迅速抽回来，反反复复，抽泣着：“怎么办？怎么办？”我差点笑出声来。可怜的她，就这么坐了一夜。肮脏的被子对我真不算回事，能够走出西沟儿，换个地方玩玩儿，还能吃上酿皮和白面馒头、红烧肉，这生活让我十分惬意。

那时的电影虽然没有几部，电影明星也只有西哈努克一位，阿尔巴尼亚、朝鲜是唯一的异国情调，《列宁在十月》演了无数遍，但是周末，只要沟口空地上的幕布一挂，大幕的前后就会放满了板凳和砖头，无论冬夏，莫不如此。以至

多年后有人带着孩子回北京看日场电影，孩子不解地问：“白天怎么看电影？”问得当妈的直辛酸，觉得孩子在沟儿里呆得真是土得掉了渣儿。

早早结束的生命

当我们这些人不再充分地年轻，谈恋爱就成了一件大事。特别是男女比例极为失调的状况，更使谈朋友成了件不易的事，有人竟然因为恋爱的挫折走了极端。

一年春节，探亲回北京的人特别多，厂里没有剩下多少人。当我们回到工厂后，听到了让人伤感的消息。工具车间的一名女学员因为男友另有所爱，几经哀求，见对方没有回头的可能，将自己吊死在宿舍的门背后，以死示其痴心。女孩儿的父亲从北京来办后事，愤怒地说：为了这种事情轻生，是我家的耻辱，没有为女儿的死掉一滴眼泪。那个男友更是无动于衷，甚至耻笑她太傻。

还有一件事是女方另有所爱，男方百求不得回心转意，竟然将自己的小指剃下一截，装在信封里送于女方。女方吓得不敢上班，领导将她调到另外的车间完事。可能是西沟儿的天地毕竟太狭小了，每年只有可数的十几天可以走出山沟儿，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期盼的事情太少了，人的感情也就不自觉地变得脆弱，心胸变得憋屈，一点挫折，竟会产生如此不幸的后果。

除了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随着生产的渐渐开展，开始有了事故，有一年，一连死了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车身车间的一名钳工，他新婚不久的爱人是我女十中的同学。那时车间使用的乙炔罐很简陋，地下放个铁桶，装上乙炔石，加水、盖盖儿，吡吡一出气，就可以用了。那天这名工人在干气焊活，乙炔气不足，他就去动压在桶上的盖子，没想到盖子一下蹦了起来，从他的头顶冲上去，将车间的水泥顶棚凿了一个洞，才落下来。他当场就死了。

另一个是车队的一个人，在车间门口等去蔡家坡的班车，他和女友要乘当天的火车回北京结婚。等车的功夫，他看到同伴们在修车，正在卸轮胎，就走过去帮忙。没想到两个人使的力量不均匀，轮胎钢辘一下弹了出来，正好打在他的额头上，将头骨掀去一半，人还没被送到医院就断了气。未婚妻和正在等待办喜事的双方家长如何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现在忆起，仍然觉得心里发寒。

悌忠是铸工车间冲天炉的炉前工。炉前挖一个三米见方，两米深的大坑，铁水包就放在坑里。出铁水时，扒开出铁口，一千多度高温的铁水从炉口流入这个铁包，炉前工们这时要将草木灰倒入铁水中搅拌，稍有个闪失，人掉进铁包，就只是一股清烟，什么也剩不下了。好在那些年，他们从未出过事故。

我自己的冲压工种也是汽车厂相对危险的工种。在沟儿里的九年，陕汽一直没有形成大批生产的能力，冲压工相对比较清闲，因此也没有出过太多的事故。倒是我在“北红汽”实习的那一年多最为险恶。冲压工是危险工种，按文化大革命前的国家劳动法本是不允许做大夜班的。在“北红汽”支左的军宣队却硬要工人们给党的九大献红心，要求12小时对班倒，造成冲压工段恶性事故频发，而且多出在清晨时刻。最惨的是一个在厂文艺宣传队吹笛子的工人，他和徒弟对面干，他取活儿，徒弟送活儿。早晨五点多，他见床子对面的徒弟困得一个劲地点头，就说“咱俩换换吧。”结果他自己也困，一个迷糊，送料的手被落下的冲头齐齐地切掉了八个指头。听送他上医院的人说，在救护车上他反复念叨的只有一句：“我的笛子，我的笛子呵！”

有一次我下夜班，清晨骑车回家，骑着骑着竟睡着了，一跤摔在马路牙子上才醒过来。军宣队的心真是钢打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跟班干活。也许让他们自己干干，就不会这么往死里用工人了。

无价财富

多年之后，我们这一千五百多学员有三百多人回到了北京，少数人转到了其他城市。大多数人随着工厂的迁至西安而离开了西沟儿，又成了城里人。但是铸造车间、车身的冲压车间等还是留在了沟儿里。

1998年，我和悌忠带着高中毕业的女儿回了一趟西沟儿。女儿刚到沟口就蹲在老乡的酿皮摊上不起来了，辣得唏溜唏溜地吃不够。沟儿里有了不止一个像模像样的饭馆，朋友们招待我们吃的那顿饭和北京的水平不相上下。我们还去看了当年的宿舍楼，红墙已经褪色，楼道里静静的，没有我们在时的热闹。朋友告诉我们，这里现在住的是本地招来的学徒工，周末都回家去了。沟儿中间的那条小溪仍像我走时一样被河堤上堆满了的垃圾挤兑着，清清、静静地艰难流淌着，

厂房周围的庄稼地郁郁葱葱，一片丰收景象，只是田埂间满撒着垃圾。二十年了，垃圾还是在搬家——从工人的宿舍楼，搬到老乡的地里。

我们到朋友家吃西瓜，大家围着放在地上的脸盆，噗噗地往盆里吐瓜子。女儿说从来没这么吃过西瓜，真过瘾。吃完瓜，我的朋友拿着毛巾给女儿擦手，他们的孩子在和我女儿忙忙同样年纪的时候死于一种怪病，我看着辛酸地要掉泪。女儿说沟儿里的人真好，以后还要再来。

这些年，同时进厂的学员中有人因为心脏病、脑血栓、癌症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大多数人陆陆续续地退了休，开始了晚年的生活。聊起来，大家都觉得自己离老还远着哪，精气神儿并不比年轻人差到哪儿。西安的朋友们还成立了合唱团，又重现当年的风采，在市里的歌咏比赛中连连获奖。

我们这一代人中去过北大荒的人爱说“青春无悔”。我们这极小的一群“三线”人，当年被领袖毛泽东荒唐的“建设三线、准备打仗”的战略思想召到了麦李西沟，是否也认为“青春无悔”呢？我无法代表大家。我自己觉得，当初我们大多数人是放弃了升学的想法，自愿到“三线”的。虽然在沟儿里成家立业的人，没有能够像大多数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们一样回到北京，但是我们有工资、我们有假期、我们有现成的饭吃，我们还掌握了一门技艺，相比后来只能去插队、去边疆农场的同代人，我们生活在天堂里，我们无疑是老三届中幸运的一小群。

这段经历对我个人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我的人生之路从此一步步走下去，没有转弯、没有断痕。我从一个工人干起，后来成了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从一个开大型冲压机的工人，到今天在美国一流的国家实验室做一名技术领域更为开阔的机械工程师。西沟儿那九年的生活对我无论是知识的获取，还是人生的历练，都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从未后悔过当初的选择，我庆幸自己当了一名“三线”工人。我是幸运的，因为我实现了自己年轻时以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做一名工人工程师。■

2006. 6. 9.

【述 往】

插队的那些事（十）

——田家两兄弟与“借”萝卜的故事

朱 特

田家两兄弟

到了大营子的二队，我认识了田姓两兄弟。兄叫田二，时年二十七八；弟名田三，大约二十四五，也许他们还要小些。两兄弟为什么这么排行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哥俩上面还有个在包头的姐姐。

认识两兄弟前，我一直以为知青是雨村唯一的外来户，原来他们哥俩比我们早几年就来雨村“插队落户”了，但他们却没有知青的名份。先认识的是哥哥田二。那是在大田里劳动，二队的全体劳力几乎到齐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群人场面很是红火热闹。田二在老少爷们群里有点与众不同，先是那装束就与雨村人有异，有着城市范儿，再是粗声大嗓中带着点京腔让我惊讶。这雨村里还有北京人？

细端详这田二哥，干巴瘦的中等个头，水蛇腰罗圈腿，面皮发黄，两只大眼，高颧骨，尖下颏下长着几根山羊胡。看得出来，这田二哥多数时间是老少爷们的取笑对象。一般时候，田二也回敬一二句笑骂，但只会引来更多的回报，这时他便做出大人不怪小人状，笑骂由人去。俗话说土地爷也还有个泥性子呢，田二哥也有恼怒翻脸时，他也会眼眶里眇荡着大眼珠子吼吼地叫骂。每逢此时，便有岁数大些的汉子出面训道：叫唤甚哩，不就是个耍笑嘛，也值得当真？田二便偃旗息鼓，黄面皮发红，把满腔怒气发泄到脚下的土地或庄稼上。

认识田二一母同胞的弟弟田三要晚些，原因是田三很少出现在大田里的群体劳动中。田三是田二的缩小版，面目相似却更加老相，加上佝偻着腰，田三更像是一个小老头，若说田三为长，无人不信。我头一次见田三是在收工回村的路上，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和他耍笑，他似恼非恼地训斥孩子们并做出打人状，孩子们轰地跑了。田三见我注意他，对我笑笑，问，你是北京来的知青？这些孩子可灰哩。话语中透出些京腔。

雨村厚道者评价田家两兄弟：哥俩不能受呢。不能受意味着不能吃苦，不能做农活；不能做农活就不是个正儿八经的庄户人，就会让人看轻几分，有失尊严。雨村男强劳力出工一天记10分，田二只记8分，和女劳力相同；弟弟田三只记5分，和十二三岁的孩子一般。

田二不是庄稼地里的把式，田三比哥哥又差了一大截，他只能和十几岁的娃娃放放牲口或做些辅助性的零碎农活。老乡们说，不是不想让他干活，实在是球也牵不成呢。田三的“经典”农活是，锄过的地在收割时成了一条胡同，不仅没有草，连庄稼也没有了。

哥俩原本生活在京城护国寺附近，聊起来我们还是邻居。大跃进的年代各地都多快好省地大干快上，进行着超英赶美的伟大建设，处处显得缺人手。田家哥俩停下学业投奔了在包头的姐姐，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是哥俩最辉煌的时候，一说起来这段日子来眼里就放光。谁知好景不长，大跃进之后就是大精简。哥俩和一千人被发配到距包头百公里远的雨村。文革前同来的人都通过各种渠道离开雨村，唯独田家两兄弟扎站下来。当初带来的安置费早已花光，却没建起一屋半舍，到我们去的时候哥俩还在“串房檐”——借住村民的闲房。

知青的到来，给了田家两兄弟的莫大安慰。田二说起往后的日子对我们说：你们走不了，我也死不了。有道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有20个知青在雨村陪伴，田家兄弟也知足了。我听了怎么想怎么觉得别扭，眼前的两兄弟就是我的明天？我不相信也不敢相信。

自从来到雨村，每年的分红如同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年忙到头，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也见不到两个钱，田家哥俩也不例外，甚至比平常人还要困难些。虽有包头的姐姐偶尔接济，也实在有限，日子过得很是拮据。

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与疼爱哥俩的人就是他们的母亲。隔上一两年，年迈的老母亲就会千里迢迢从京城来到小村住上十天半月，为两个宝贝儿子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这是田家兄弟日子最滋润时候。

那年秋天，我看到哥俩不仅干干净净还换上了新衣服，黄面皮上容光焕发透着喜庆。田三还美滋滋地向我显摆那件正反都能穿的上衣，喜欢得不得了。我一问，果然是老人家又为儿子来到了雨村。我前去看望时，老人正忙着给儿子们做过冬的衣服。老人家干净利落，一看就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年

岁虽高身子骨还硬朗。老人家与她的两个儿子在我眼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样的母亲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再窝囊孩子也是母亲的心头肉，田二田三在雨村的境况怕是给老人增加了更多的放心不下。我离开雨村后，年迈的老人再次去雨村看望她的儿子时，突如其来的急病把老人永远留在了雨村，留在了到死还牵挂着的两个儿子生活的地方。我听说后，心里一阵酸楚。

我最后见田家兄弟是在1975年，我从呼和回雨村看望仍在村中坚守的三哥。那时哥俩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屋，那是雨村人帮助盖的干打垒的小土屋。屋子虽小也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固定的窝，哥俩见到我很高兴，领着我去看他们的家。

又过去了许多年后，听雨村人说，田家哥俩终于离开了雨村，但不是重返钢城包头而是冀中老家，是他们的姐姐一手操办的，条件是哥俩放弃京城父母留下的两间房子的继承权。田家兄弟也算是落叶归根吧，但愿他们的晚年能活得有些气势。想起这哥俩来多少有些惭愧，两人的大号至今也不知道。

“借”胡萝卜的故事

刚到大营子不久，我们得了两三斤羊肉。这点羊肉怎么来的，已经全不记得了，也许是小队里杀了羊给社员们分的，也许是老乡家里杀了羊我们从老乡那里买的，总之我们有了可以改善生活的羊肉。那时长年很少见荤腥，偶尔能有点肉吃实在是让人兴奋的事。

怎么把这点羊肉发挥到它的最大值，让我们的口腹之欲得到最大满足？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吃饺子，好吃不过饺子嘛。胡萝卜羊肉馅的饺子在雨村里是上了讲究的，可是我们只有羊肉却没有胡萝卜。这时的胡萝卜还长在地里，不到收获的时候。二饼子主意多，他提出一个方案，能不能先从地里借点，不多借，够咱们吃一顿饺子的就行。大家说这是聪明人提出的好主意，而且还说这个“借”字用得对，都举双手赞成。我说，三队的玉米地里套种的就是胡萝卜。

可是由谁去“借”呢？我自告奋勇，第二个人就是二饼子了，由方案制定者做方案执行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二饼子也乐呵呵地接受了大家的嘱托。

吃过晚饭，我和二饼子在宿舍里和三哥包四聊会儿天，问有手表的力兄，说是九点了。我和二饼子觉得时辰差不多了，起身行动，他提了个筐带了只手电，我则扛了把铁锹，向村外走去。那天是个月明星稀的好天，月虽未当头可也明晃

晃地照着大地，雨村人都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一路出村没有碰到一个人，我心里很踏实，不时和二饼子说些悄悄话。

我知道的三队套种胡萝卜的玉米地就在雨村南边出村不远。是一块很大的地块，此时玉米已经长到没人高，人进去立刻淹没在高大的庄稼里，外边人根本看不见，这给了我们“借”胡萝卜的人很大的安全感。彼时雨村仍是实行广种薄收之法，由于地力不均，偌大的玉米地里或是疏可走马，或是密不透风。二饼子打手电给我照明，我也专找那郁郁葱葱处下家伙。庄稼地里很热，我出了一身汗，东一锹西一锹感觉“借”得差不多了，就问二饼子，够不够一顿饺子的了，他看了看筐说，三顿的也够了。我说，你怎么不早说？那赶紧撤吧。他似有怜惜之意说，看你干得那么用心，我不忍心破坏你的兴致。

三绕两绕我们钻出了一人多的高玉米地，我向回村的方向走去。二饼子一把拉住我说，哎，你干嘛去？我说回村呀。他指着相反的方向说，村子在那边。我说那边是恼木汗。我歪着脑袋看着他笑，你转向了，跟我走吧。二饼子不相信我的认路功夫，还跟我“掰吃”，此时听到有人大声问，那是谁，做甚的？随着问话一道手电光射来，那个人也向我们走来。我和二饼子赶紧自报家门。走到跟前原来是三队的一个后生，和我们同年仿佛，是知青宿舍里的常客。他看到我们和胡萝卜，笑了，说，到小屋里坐坐吧。原来，在黑夜中我们绕来绕去走到了看青人的小屋前，两个人的吵吵声把看青的后生惊动，把他叫了出来。到了小屋里，后生什么也不问只和我们拉家常。尴尬的我们却不得不作解释，想吃顿饺子却没有胡萝卜。后生看看筐里的胡萝卜很仗义地问够不够，不够再“拾”些？我们连忙说够了够了。问他回村怎么走，他指了指方向，我对二饼子说还是你转向了吧。

离开仗义的看青的后生，我们再也不想碰见任何人了。可就是在已经看到知青宿舍灯光的时候，在一拐角处迎面撞上了我们二队的队长怀怀，打招呼瞬间，他看到了我们“借”来的胡萝卜，笑问，想吃包饺子了？我们笑答是哩是哩。真是不好意思呀。

彼时常有人说知青在农村常做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事，那是有的。但雨村知青在小村前前后后十余年，如果说这也算是的话，我们做了这样一件“借”胡萝卜的事，而且做得也不漂亮，让所有不应该看到的人全都看到了；然而，他们看到了就像没有看到一样。多年后想起来，对雨村人的宽厚仍心存感激。■

【述 往】

北师大文革琐忆

安希孟

1966年冬天，朔风凛冽，我们造“工业学大庆展览”的反，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奉旨伐罪，持有上方宝剑。那里面还有刘邓的照片，是可忍孰不可忍！刘邓一上台，那可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不是闹着玩儿的。表面上轰跑了工作组，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实际上是受命于天，牵线木偶。我们每晚被大车拉到国家经委占领三里河木樨地，在人家宽大办公室沙发软椅楼道里静坐躺卧。犯困时打盹，小腿转筋，嗷嗷直叫，也没怨言。我真的不知此行的目的何在，不知此举关乎最上层政治斗争。大学生文明，不吵不闹，也不砸不抢。“上面”头头们应该同国家经委头头有联系，要求陶鲁笏“站出来”或曰“滚出来”。一天晚上，忽然后人影散乱，脚步匆匆，中央首长来会议室接见了，穿着军大衣的是戚本禹。余秋里、陶鲁笏显然不如戚公神气！戚与余训斥了陶公！陶公的主要罪状是慢待革命群众，让我们受冻了。北师大后来派串连小分队去大庆造反，可能是为了肃清“刘毒”吧。真不知哪来的这股傻劲！一根筋！

1967年夏日炎炎似火烧，首都百万大军日日游行，揪刘火线发誓揪出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不过我们打心眼里并不真的仇视刘少奇。相信比我们更激进更贴近上层的人们未必真的对刘邓陶切齿痛恨。许多人很大程度是觉着政治游戏好玩。北师大的旗帜飘扬，在首都红卫兵中是翘楚，也使我们有几分自豪。青年人的热情被绑架。1967年夏，一次瓢泼大雨中游行，我身上出荨麻疹，冻得打哆嗦。北师大革委会谢天德部长接获新华门8341禁军兵弁通知，用摩托车把我送回。谢部长是我们那一代人中自觉自为的阶层，非吾曹阿斗辈稀里糊涂随大潮裹挟而下者。1967年初北师大去武汉串连支左，在我们盲无目的，他却知道谁敌谁友这个根本问题。

1968年春，京城高校部分造反组织炮打谢富治。然而炮打司令部，并非弹无虚发，刀刀见血，有时弹着点就落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房顶上了。这一次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宝押错了，杨余傅被当作“变色龙”揪出，连同1967年秋被揪出的王关戚“小爬虫”，共两类动物。倒谢积极者为北京高校天派和三军无产阶

级造反派，大家同属一窝。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属这一股，他们也叫井冈山，为嘛？因为当初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就是他们始作其俑，谭厚兰上山后，翦除王伦，有些井冈山人当初还在“伪红卫兵师”任军职。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等井冈山“元老”们被赶下山，又另立井冈山造反兵团。这次“倒谢”，史称“右倾翻案风”。杨余傅被抓，造反兵团倒谢失败，“龟缩”工五楼，于是有了井冈山掌权一派4·21攻打包围工五楼一役，比林总包围长春，城里不许出城一个麻雀也飞不出略显逊色，但井冈山革委会指挥武斗豪气干云断水断粮断电也不亚于当初。汽车轮胎制作强力弹弓向工五楼窗口发射。长矛剑戟发出寒光，被包围在楼内的造反兵团官兵们的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里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凄婉动人。但攻打他们的人，已经进入梦乡，不曾听见。

文革他们还是少年，少不更事，且如今反省了，悔罪了，致歉了，负疚了，俯首了，鞠躬了，潜然了。不知反省，不知悔罪，不知致歉，不知负疚，不知俯首，不知鞠躬，不知潜然的，有北师大革委副主任二号人物。他脸皮厚，不但勇猛且疯狂指挥武斗，初露军事才华，打砸北师大工五楼，他亲自拉长强力弹弓的汽车轮胎弓弦，断水断电让工五楼里的造反兵团“黑夜想念毛泽东”。他在批斗自己入党引路人杨芝岭老师时是急先锋。他紧跟工作组，抓学生右派走在前列，又是保守派伪红卫兵师筹委会团长。押解斗争彭帅按脑袋踢打，批斗彭真、余秋里的也是他。他喜投机，从保皇派红卫兵师团级一下窜升到井冈二号成副师级。1967年9·7事件，他痛哭流涕发誓从林杰、谭厚兰贼船上下来。他把英二年级吴正明（现为苏州特级教师）同学打成反革命……■

附言：我对于谭厚兰，二号人物董连猛（我们班的），没有特殊仇恨。只是看了女附中之事有感。谭（北师大头头）已死，可哀，不应该苛责。我多年的文章还是同情。但董连猛至今怀念流逝的岁月，仇恨对立面，不可思议，不可原宥。去年返校，初听他诉苦，我还表同情，后来就觉着不对了。他也无辜，但整肃人向上攀爬，就不对。我们应该消除仇恨，但消除仇恨应该通过自我反思，当然不能无原则无操守。

【资料】

北京第一机床厂

“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1967年1月12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北京第一机床厂全体红色造反者，全体革命职工，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今天，在我们北京第一机床厂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誓师大会上，我们以无限兴奋的心情向您汇报：在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我厂革命力量越来越壮大，形势越来越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越来越孤立，他们的反动面目已被更多的革命群众所识破。目前，我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全国一样，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重重阻力，汹涌澎湃地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发展！

“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并且一再强调的重大方针，但是令人气愤的是，我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千方百计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一伟大方针。开始，他们假借“抓革命，促生产”为名，行“以生产压革命”之实，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他们的鬼把戏被戳穿之后，他们又在玩弄新的花招，撂挑子，撒手不管。更加恶劣的是，他们以经济福利、物质刺激为诱饵，妄图把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上去，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破坏生产，以达到破坏我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恶目的。

面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我们第一机床厂全体革命造反者的坚决回答是：叫它们完蛋！“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天塌下来我们能顶住！地陷下去

我们能填平！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造反者！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革命造反者，心最明，眼最亮，是最听党中央和您的话的！

“白色恐怖”吓不倒我们，“糖衣炮弹”也打不倒我们。谁稀罕他们这几个臭钱，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

我们深深懂得，不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挖掉修正主义的老根，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工厂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我们就会被重新打入苦海，世界革命人民就要遭殃！

“抬头望见北斗星，日夜想念毛泽东。”是您，在我厂白色恐怖时给我们斗争的勇气；是您，每当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今天，面临彻底完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输红了眼，大肆破坏生产，大搞经济主义，猖狂地向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全面反扑了。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敬爱的毛主席，您给我们撑腰，我们给您争气！不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我们死不瞑目。

我们的决心是：坚决贯彻执行您提出来的方针，狠抓革命，大促生产。我们坚决保证：一面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面坚守生产建设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力争产品的高质量。

我们的口号是：既做革命的尖兵，也做生产的闯将。誓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誓夺一九六七年的革命、生产双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们庄严地向您宣誓：一定要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一辈子跟着您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做一个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您老人家的红色造反者！

最后，衷心地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新华社十五日电《人民日报》

【资料】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年1月22日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体战士，向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怀着万分喜悦与激动的心情，向您老人家报喜：今天我们青岛市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把青岛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从省、市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手中统统夺过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前青岛市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的操纵把持下，长期以来，违背、抵制您的教导，对广大革命群众执行了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又公开对抗中央指示，肆意抵制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工农反学生，打击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震惊全国的“八·二五”、“九·一”反革命事件，妄图把您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扑灭，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为了勇敢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捍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誓死保卫您和以您为首的党中央，今天，我们造了青岛市委资产阶级老爷的反，夺了他们的权！我们成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为基础的大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我们把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从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手中夺回来，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让它一代一代传下去，确保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今后，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

您的书，听您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您的指示办事，永远做您的好学生、好战士。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执行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批臭、批垮。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您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的双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曾谆谆教导我们，敌人决不会自行消灭，他们也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夺取政权后，我们一定遵循您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学习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市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仍然执迷不悟，死不回头的家伙，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们一定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把一切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把青岛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让青岛市每一个角落都永远闪耀着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青岛市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敬祝您老人家，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67年1月30日《人民日报》

【资料】

途经莫斯科的全体国外留学生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年1月27日

我们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当莫斯科的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们和使馆全体同志一起收到了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代表您老人家和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给我们发来的电报。

您的电报——这是您对我们全体的战斗动员令。

我们把您的语录紧紧贴在胸口，一股巨大的暖流流遍全身。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是对我们最大最大的支持，最大最大的鼓舞，最大最大的关怀。您老人家最理解群众，最信任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

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您最忠实的红小兵。您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还怕几个在冬天雪地里快要冻死的臭苍蝇么！我们头可断，血可流，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我们一定要大造特造现代修正主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群小丑们的反。我们一定要大造特造、猛烈地造世界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叫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把旧世界砸它个稀巴烂，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在全世界大放光芒。

我们在国外亲身体会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它们早已吓得六神无主，魂不附体了。

我们就要回到您老人家的身边了。我们决心全力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在一起，誓死捍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地、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跟着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打倒美帝国主义！

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扫除一切害人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衷心地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67年1月29日《人民日报》

【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把夺权斗争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7年2月10日

最最最敬爱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黑龙江省军区部队全体指战员，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们看到《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用实际行动全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又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您的声音，心情万分激动，浑身热血沸腾。敬爱的毛主席，这是您老人家对黑龙江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干部，也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鼓舞，最大鞭策。我们一定牢记您“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您的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坚决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省委内执行您的革命路线的主要负责人站在一起，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坚决镇压向革命路线反扑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在生死与共的战斗中，我们和革命干部、红色造反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实行了联合行动，把省的党、政、财、文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回来，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是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是我们最最伟大的统帅。我们是最忠实的最忠实的革命战士。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您指到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在全省红色造反者和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

时刻，我们向您宣誓：把您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更好地落实在行动上，决心和全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在一起，最坚决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全省的夺权斗争进行到底。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需要我们援助，我们就立即出动，全力支援。刀山，我们敢上；火海，我们敢闯。坚决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坚决拥护、坚决服从全省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为建设新政权、巩固新政权作出更大的贡献，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于那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和一切牛鬼蛇神，坚决镇压。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导：“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提高革命警惕，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胆敢向我们挑衅，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

我们坚决响应您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新阶段，把“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当作座右铭来学。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

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读者来信】

1. 越人谈李南央之文

最近《记忆》登载了李南央先生的几篇文章，前些年读过她写母亲的长文，确实犀利和发人深省。不过对于她写卡玛那篇文章，却有点不同意见要发表。王容芬的文章无疑存在失实之处，而且就算卡玛在文革中曾经积极参加过这场运动，但以此为理据否定她后来的表现与作品，倒是党史上尤其是文革史上的常见的某种思维模式。不过卡玛究竟在文革中有怎样的表现，我想任何一个对此争论公案有兴趣者应该都是想了解的，可惜李南央先生对此却是语焉不详。

另外要指出的是，李文中对于卡玛姑父姑母事迹的叙述值得商榷。李南央先生说是美国政府曾欺骗了这些单纯的学者，这些人因了解了相关情况而醒悟转向，个人觉得这一判断不够严谨。近些年来解密的美苏档案，都揭示了二战前后苏联对于美国的深入渗透（相关可参考的中文翻译书籍有《维诺那计划》、《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等），大批美国的左翼分子，包括不少科学家都因各种原因早在参与原子弹工程前就成为苏联的间谍或向苏方提供情报。将他们的转向归结为受骗后的觉醒，恐怕需要更多的历史证据。而且正如单世联所言，“革命远远不只是穷人的事。许多坚定的革命者就是名门之后，甚至杨度这样的晚清遗老和国民党要员如傅作义、陈布雷的女儿，这些‘不肖子孙’都背叛了他们所属的家庭和世界。在个人道德上，他们‘自毁前程’，自我牺牲，确具崇高感。但他们参与的革命在彻底破坏了他们厌恶的现实之后，是否创造了一个更为公正而合理的社会秩序，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从而历史对他们的崇高道德应当有更全面的考量。”（单世联：《“地下”与“地上”——读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如果说美国政府欺骗了他们，他们要转向左翼，当“美丽新世界”产生了种种可怕的罪行时，那他们又为何不觉醒乃至再转向呢？所以这种受骗觉醒说，窃以为不过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种自认为正当的借口或理由罢了。

2. 张晓良谈 128 期的误植

第 128 期有些误植，详如下——

38 页 10 行，“团龄自添表那天算起”，“添表”是否为“填表”。

39页13行，“这对我是最叫劲儿的时候”，“叫劲儿”是否为“较劲”。

41页16行，“凌冽”，应为“凌冽”。

52页倒数6行，“有利武器”，是否为“有力武器”。

本期选载了《想起往日苦》、《牢记阶级仇，紧握手中枪》两首歌词。《想起往日苦》是湖北天门民歌，“想起往日苦”一句，湖北方言唱作“想起往二苦”。抗日战争，林师长（林彪）作动员，“打日本”读作“打二本”，林彪为湖北黄冈人。其实还有一首《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也传唱广泛，开头是“天上布满星，月芽儿亮晶晶”。五段歌词，辽宁省丹东市文工队创作员王玉文作词，曹世才作曲，1962年发表于《上海歌声》，同年灌制唱片全国发行。

3. 别题谈感想

这一期感觉非常好。读者说要“从根儿上说起”，从剩余价值谈起，就是老根儿了。马昌海先生的《地主的“剥削”与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以及三个附录非常有力量，资料详实，论证平和而坚实，彻底否定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合理性。

田小野的《北京女一种文革纪事》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文革的史料。读之，文革岁月历历在目；不读，我这个过来人几乎把那个年月忘记了。若她不写出来，后人怎么会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受害者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而施害者也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发人深思。

4. 慰祖谈李南央的“五个面向”及湖北天门民歌

李南央的“五个面向”记忆有误。1968年4月4日中央提出大中学校的学生毕业分配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第128期选用的那首湖北天门民歌，来自我的老家。江汉平原历来是鱼米之乡，中共建政前除非遇到天灾人祸，平常年间很少有饿死人的。我至今还记得幼时祖父教我念过的一首湖北民谣：“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收得一年，狗子不吃麦米粥”。夏秋之际汉江、荆江江水暴涨，常常出现涝灾，但饿死人的事却不多见。老家的人告诉我，文革中老贫农“忆苦思甜”，一上台就说1959—1960年饿死了多少人，弄得主持诉苦大会的干部不得不大叫：“是要你们忆解放前蒋介石的苦，不是让你们忆刘少奇的苦！”这是把三年大饥荒也归罪于刘少奇了。

5. 刘建业谈任国庆之文

先是感谢您的使命感、责任感，为国为民为子孙后代所做功德无量的事情。以前只是看，从未发表过言论。今天忍不住冒昧说几句：

第一篇，任国庆有关马克思“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论述，很有新意！作为也曾经在下乡插队、煤油灯下读过几本马克思经济学原著的我，对作者的剖析非常赞赏和支持！

美中不足，感觉到有一小点瑕疵，是否应将马克思与列宁、斯大林、毛等人区别一下？文中说，马克思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他所描述的理想国实现之前，这个“每个人”是不包括地主、资本家的。

这个说法似乎武断了些。如何能断定马克思所言“每个人”“不包括地主、资本家”呢？马克思虽提出“剥夺‘剥夺者’”，但不会赞成后来列宁、斯、毛等人那种血腥、残忍的形式。马氏似乎更看好“商品经济再也无法向上发展”之时，社会主义自然而然到来。是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也似乎相信大多数资本家不会反抗，因为物质太充分了，没有再积累的必要。他不会认同列宁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社会里建成的“社会主义”，如果活着，相信他也不会承认列宁搞的是“社会主义”。而列、斯、毛式的屠杀和剥夺，恰恰发生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的“社会主义”。虽然建立在马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但却是被修正后的马主义，与原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别。

6. 任国庆答刘建业先生

刘建业先生说的有一定道理，马克思跟列宁，毛是有区别的。但是，其实马克思在怎样对待“剥夺者”的事情上也是摇摆不定的。到《共产党宣言》发表，提出“剥夺剥夺者”，他已经跟早期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傅里叶、欧文等人的观点决裂了。所谓“空想”，其实是在“马克思主义使空想变为现实”之后才被命名为“空想”的。人家傅里叶是真诚地认为这不是“空想”，“空想”是后人给他们起的名字，以彰显“我们是科学共产主义”。从马克思的哲学讲，他是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所谓“自然进入共产主义”应该不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这不符合他的哲学理念。

我说如上这些只是凭借记忆而已，要辩扯清楚，要下功夫查看原著了。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